蛰居散记

郑振铎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作家、文学史家。一九二一年与茅盾、王统照等组织文学研究会，后主编《小说月报》，曾在复旦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并致力于学术研究。著有《取火者的逮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另有文学译作多种。新中国成立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五八年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名誉主编：巴　金

主　　编：楼适夷　林淡秋　柯　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蛰居散记



郑振铎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蛰居散记

郑振铎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3.75印张　3插页　69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50

书号：10173·351　　定价：0.37元



郑振铎像

浩劫之後繼以焚燬古籍之存世者鮮矣近數月來紙商復以重值搜羅舊書為製紙原料各書肆对於巨帙之廉值書皆綑載出售實閣籍之又大阨也予目擊心傷挽救無力昨來青溪得中國書店存書八十餘札某亦欲售予紙商予大憤傾囊悉得之此十國春秋之即其中之一也伯祥兄以欲得此書謹以贈之並志劫中之一紀念物也

諦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志

作者手迹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

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

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三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肖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

务。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中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新　　序

这部《蛰居散记》的大部分是登载于上海的《周报》上的。当刚刚胜利的时候，我还是相当天真的只看到一面，虽然在写着的时候，已不断的受到压迫。我明白美帝国主义者的本质，也明白蒋帮的一贯的卖国行为，但我那时候还未能完全确切的看出蒋介石是美帝的代理人。一方面深诛痛恶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描绘着八年来自己身受的痛苦，一方面却不能及时的觉醒到美帝的更为险恶与凶狠的心肠。这是值得自己深切的反省的。警觉性不够强，同时，研究问题也不够深入。且为一时的虚伪的“胜利”和很单纯的爱国主义所冲动，在那时候，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天真无邪”的。我们不断的受到蒋帮的迫害，例如删改文字，没收出版物，恐吓出版家等等，还总以为这只是蒋帮的罪恶，并不曾更深一层的去看透美帝指挥操纵的内幕。到了蒋帮大规模的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美帝不断的送军火、送接济给他们，方才开始确切的认识到美帝的真面目。在那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发表言论的机关了。我感到痛苦，感到苦闷，感到自己过去的浅薄。这可见单有热情与正义感是绝对不够的！如

果没有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指导，必定会把问题或事实看成很单纯了的。现在把这部小书，重行整理了一下，印了出来，作为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残与压迫的记录的一部分，且作为痛定思痛的纪念。同时，读者们应该更进一步的明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是如何的凶险与可怕，不由得不激起爱祖国的热情。作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状，同时也正是控诉美帝正在扶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状！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我们不能不以全力来反抗美帝的侵略！

谢谢刘哲民先生和高季琳先生，他们替我做了一部分整理的工作，且使这部小书能够有机会出版。

一九五一、四、七、郑振铎

目　录

自　序

胜利！胜利！胜利！

我们在水深火热的沦陷区里，度日如岁，天天盼着胜利的到来，简直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忍受着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痛苦；我们吞声饮泣的睁眼看着狼虎的择肥而噬，狐兔的横行，群鬼的跳梁；我们被密密的网罗覆罩着；我们的朋友们里，有的杀身成仁，为常山舌，为文氏头，以热血写了不朽的可泣可歌的故事；有的被捕受刑，历尽了非人道的酷暴的待遇，幸而未死，然已疮痍满身，永生不愈；最大多数的人民是受着不可言说的压迫与恐怖，日在饥饿线上挣扎着；言之痛心，闻者酸鼻。

然而别一方面却是荒淫，奢靡，快乐无度。无耻与丧心病狂者流，统治了一切。敌人与勾结敌人之奸官，奸商，莫不致富万万，乃至数十百万万；人民求食所谓“文化粉”（北方以豆渣、花生壳、高粱、黍米等合磨为粉，称之为“文化粉”）而不可得，而彼等则食必珍羞，日掷百万而无吝；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着，而彼等则灯火辉煌，俾夜作昼；人民出无车，而彼等则汽车如虎，街头疾驰；人民住无室，而彼等则高楼

巨厦，三宅四院而尚嫌不足；人民妻离子散，而彼等则娇妻艳妾，左拥右抱；人民衣裳褴褛，鞋穿袜破，而彼等则冠戴堂皇，靴光如漆。极度的荒淫无耻与极度的受压迫的呻吟，作着极鲜明的黑与白的对照，是地狱相，是鬼趣图。

而现在，胜利终于到来了！

但在这样的一个黑暗时期，一个悠久的“八年”的黑暗时期里，如果能有一部详细的记载，作为“千秋龟鉴”，实胜于徒然的歌颂胜利的欢呼。

我从“八·一三”事变后，便过了好几次的流离迁徙的生活；从“一二·八”后，便蛰居于一小楼上，杜绝人事往来。虽受着不少次的虚惊，幸而未作“楚囚”，未受刑迫。胜利的欢呼，使我从冬蛰里苏生。我没有受害，没有入狱，竟也没有饥饿而死，不可不谓为一个“奇迹”！我在这里以十万分恳挚的敬意，致谢于许多帮助我隐匿着，生活着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的好意与有勇气的担当，我也许早已遭逢了不幸。

劫后余生，痛定思痛，把这几年来目睹耳闻的事实，写了下来，成为这本《蛰居散记》，也许可以使将来的史家们有些参考罢。是为序。

一九四五，八，二十。

一　暮影笼罩了一切

“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

但不是绝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坚定的抵抗与牺牲的开始。

苏州河畔的人渐渐的散去。灰红色的火焰还可瞭望得到。

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

是群鬼出现，百怪跳梁的时候。

没有月，没有星，天上没有一点的光亮。黑暗渐渐的统治了一切。

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钢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准备着随时离开家。先把日记和有关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去。

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旁。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蒙蒙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生活也许立刻便要发生问题。

但挺直着身体，仰着头，豫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的作着应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协会有重要的决议，成为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机关。《救亡日报》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们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他们开始称上海为"孤岛"。但我一时还不想离开这"孤岛"。

夜里，我手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温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间的暖热可爱。在这样彷徨若无所归的一个时间，格外的觉到"人"的同情的伟大与"人间"的可爱可恋。个个人都是可亲的，无机心的，兄弟般的友爱着，互助着，照顾着。他们忘记了将临的危险与恐怖，只是热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时更亲切，更关心。

白天，依然到学校里授课。没有一分钟停顿过讲授。学生们在炸弹落在附近时，都镇定着坐着听讲；教授们在炸声轰隆，门窗格格作响时，曾因听不见语声而暂时停讲半分数秒，但炸声一息，便又开讲下去。这时，师生们也格外的亲近了，互相关心着安全。他们谈说着我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可靠，信任着我们的军官与士兵。种种的谣传都象冰在火上似的消融无踪。可爱的青年们是坚定的。没有凄惋，没有悲伤；只是坚定的走着应走的路。有的，走了；从军或随军做着宣传的工作。不走的，更热心的在做着功课，或做着地

下的工作。他们不知恐怖，不怕艰苦，虽然恐怖与艰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教员休息室里的议论比较复杂，但没有一句“必败论”的见解听得到。

后来，“马其诺防线”的防守，证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杀在进行。“马当”的防线也被冲破了。但一般人都还没有悲观。“信仰”维持着“最后胜利”的希望。“民族意识”坚定着抵抗与牺牲的决心。

同时，狐兔与魍魉们却更横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维新政府”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辞。

汉奸们渐渐的在“孤岛”似的桥南活动着，被杀与杀人。有一个记者，被杀了之后，头颅公开的挂在电竿上示众。有许多人不知怎样的失了踪。

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了。

学生们常常来告密，某某教员有问题，某某人很可疑。但我还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

但事实证明了他们情报的真确不假。

有一个早上，与董修甲相遇，我在骂汉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来上课了。再过了几天，在报上知道他已做了伪官。

张素民也总是每天见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见，但不

久，也便消声匿迹，之后，也便公开的做了什么“官”了。

还有一个张某，和陈柱，同受伪方的津贴，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陈柱（这个满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东西）“走马上任”，张某被友人且劝且迫的到了香港发表“自首文”时，我也才觉得自己是被骗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与对于知识分子的过分看重啊！

学生里面也出现“奸党”。好在他们都是“走马上任”去的，不屑在学校里活动；也不敢公开的宣传什么，或有什么危害。他们总不免有些“内愧”。学校里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虽然是两迁三迁的，校址天天的缩小，但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

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带着些警觉性。可爱与骄傲，信仰与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活动的趋向。

我还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时候也到古书店里去跑跑。偶然的也挟了一包书回来。借榻的小室里，书又渐渐的多起来。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的警觉着戒备着。

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来过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搜查时，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

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象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订本"便由汪馥泉运到香港去。敌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国书店过。亏得那一天我没有在那里。

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

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的有人去问他们。

隔了一个多月，好象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会发生，我才再住到家里去。

夜一刻刻的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的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的为虎作伥的事。

这战争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识"；也使民族败类毕现其原形。

二 悼胡咏骐先生

我和咏骐先生的相识，不过三年左右。上海战役失败之后，上海的情形，紧张，混乱。友人们撤退的，躲避的纷纷不绝。在其间，也有许多若橡树似的，屹立于暴风雨之中而坚定不动的，咏骐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他稳定的站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象一个巨人似的；在他的巨影之下，许多人赖以安定，不惧。他执了一盏光明四射的灯笼，在茫茫黑夜里，引导着许多人向前走。他的勇敢、冷静与明晰分毫的理论，增加了同伴者无穷的勇气。

他不是一位孳孳为利的普通商人。他看得远，见得广，想得透澈。他知道一个商人在这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一切措施，一切行动，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题的。他从事商业近二十年，但他的经济情形也仅足够一家温饱而已。而对于爱国事业，则无不竭力帮助着；比千万百万富翁所尽的力量更多，更大！

他主持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他的看法，是把"人寿保险事业"作为"社会事业"之一的；并不为了营利。他应用了

最科学的方法，经营“人寿保险”事业；有许多设施，足为后来人最好的楷模。

有一次，他和我谈起：公司的投资，以投于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为主。购买外汇，垄断米粮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的都是民族的罪人。他的公司绝对的不愿做这种事。他和我商量，要把一部分资金从事于保存民族文化。我尽力的赞成他，说：我愿以全心全意的帮助他做这件事。可惜商谈后不久，他便一病不起，再没有机会做这件事。这实在是民族文化之一大损失！也是他有志未遂的事的一端！

他待友笃信。对于穷的文化人——文化人没有不穷的——尤其愿意用种种方法来帮助。有时，得到帮助的人竟不知道是他的力量。

他有信仰，他有理想，他有远见。他见到最后胜利的不远；他信仰我民族的必有光明远大的前途。他鞠躬尽瘁于兹；虽病已深，体已弱，虽已弥留在病榻上，也还念念不忘于兹！

一个火种遗留下来，可以传之不熄。他便是这不熄的火种。

他虽死，但他的巨影还荫覆着无数的未死者们。他虽赍志以死，不及见最后胜利的完成；但未死者们一念及他的忠笃的大无畏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便增加了无穷的勇气。

他虽死，但他的精神不死，我们悼念他；但我们一念到他，便应想到要完成他未完成的遗志，未完成的工作与他的未实现的信仰与理想！

他这埋伏下来的火种，这精神，是永远不熄的！

三　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

在洪水横流，天地变色的上海，友人们首先遇难的是刘湛恩，张似旭二先生.

在那个时候，伪"维新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一个牛鬼蛇神的"大道市政府"，在鬼鬼祟祟的帮助着敌人干着谋杀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地下的组织，包括了比较上层的爱国分子：有实业家，有银行家，有保险业者，有青年会的干事，有航运公司的人，有书店老板，有报馆记者，有著作家，有海关上的职员，有会计师，有大学教授等等，每星期有一个秘密的集会.在三四年间很做了些事。在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专门做对外宣传的机关，"国际问题研究会"，刘湛恩和胡愈之二先生是其中的主干，温宗尧也在这会里.他们在国际上很发生了些作用.

湛恩先生是慷慨激昂惯了的，在这会里，说的话最多，做的事也最多。当时不知道温宗尧已经变了，已经变做一个敌人的走狗，还引他为同志而推心置腹的对待他。但在伪"维新政

府”将出现的前夕，湛恩先生听见人言籍籍的说温宗尧也是参与“维新”组织的一人，他素来心直口快，便正言厉色的质问着他．温宗尧绝口的否认着．他倒相信了温宗尧的话．不料这一次的会却是最后的一个会．过不了几天，温宗尧终于现出他的汉奸面目，湛恩先生也遇刺成仁．“国际问题研究会”遂以解散．

友人们都相信湛恩先生的死，是温宗尧所主使或告密的．象湛恩先生那样的嫉恶如仇，无所顾忌的人，敌人也许早已列在黑单上；不过这一次的事，更促成其早日发动而已．

湛恩先生他自己恐怕也已经发觉了“危险”；他预备要离开上海．他这时正担任着沪江大学的校长职务．为了他的慷慨与无畏，沪江大学里举办了不少附属的机关，成为上海一般热忱的青年“向往”的中心，他一死这些附属的机关便都烟消云散或“迁地为良”了．

如今想起湛恩先生成仁的情形还宛然在目．

有一天，我在薄暮的时候，夹着皮包，到沪江大学的一个附属机关去教课．在圆明园路的转角上，遇到了湛恩先生从对面走来．

我们立谈了一会。我问他道：“你的汽车呢？”

他道：“已经出卖了；预备就要走。”

我道：“你走了，事情怎么办呢？”

他道：“已经交代妥当了；随时可以走．”

“感觉到有什么迫切的危险么？”

他点点头。我们黯然的握手久久而别。

这一别便不再相见！

第二天上午，我坐了双层的公共汽车往东边去了。经过了静安寺路大华路口，有人问道：“早上有一个在这个地方被打死的么？”卖票的答道：“对的，我的那趟车刚好经过这一站，亲眼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凶手朝北逃。听说后来已被捉住。”

在这时，这种恐怖的暗杀事件已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所以大家也变成不大好奇。我却纳闷着：这死的到底是一个仁人志士呢，还是一个汉奸？

旁晚，晚报出版，封面上赫然的用大字载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遇刺”的消息，说是，湛恩先生上午九时，在大华路口等公共汽车，一个凶手从后边跑过去，对他开了一枪，立即转身逃去。但逃到爱文义路附近，终于被路人和巡捕逮捕了。这凶手不肯说出主使的人来。

我执着报纸的手因愤激而微微的抖着。友人们里第一个为国牺牲的人，第一个死于自己人的手里的人！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人替敌人来暗杀爱国之士的！

也许是我的“幼稚”吧，我从来不曾想到过，也从来不会相信，会有人肯替敌人做事的——除了本来是不足齿于人类的伪“大道市政府”的一批“流氓”们。上海人至少是会采取消极的不合作主义的。难道还会有什么丧心病狂的替敌人奔走效劳么？后来知道虹口方面的公共汽车恢复了，招考女卖票员，居然有人去投考，居然考取了，已在车上卖票。我

总以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事”。难道她们会有面目与车上乘客天天见面么？想不到竟会有人更进一步的替敌人来谋杀我们自己的仁人志士！

我伤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郁郁闷闷的感到心头上有一个瘤结，化不开，消不去！我不仅仅伤心湛恩先生的死，不仅仅悲哀一个同道的伟大的人物的凋谢，我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融铸为一体的抗敌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坚持了！——当然后来一件件的事实，证明我这个“信念”也许有些太“幼稚”。

“如果湛恩先生不卖去汽车，也许可以不至那末容易被刺中吧？”我心里想着。

但后来知道，警务人员曾从凶手身上搜出一张小条子，上面有几个数字。问他，不肯说是指的什么东西或有什么意义。经过一番调查，才明白那几个数字乃是湛恩先生汽车的号码。可见敌人处心积虑，欲置湛恩先生于死地者为时已久。即坐了汽车，也是不能避免的。所可憾者，湛恩先生的到香港的船位本已定好，过两天便可以脱出险地；不料他们发动得那末快！这位同道的伟大的人物便这样的“成仁”而死！

湛恩先生死后不久，复有张似旭先生的被刺事件发生。

似旭先生是经常的在上面所说的那个地下的爱国团体出席的。他虽然是英文《大美晚报》的记者，却是一个强烈的正义感的爱国者。在国际宣传上，他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从湛恩先生被刺后，他的踪迹便相当的秘密。

我有时在跑马厅北首的一家德国咖啡馆里喝茶；那个地

方人很少，尤不易碰见相识的人；窗外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眼界很宽很爽。

似旭先生便在这个咖啡馆里被刺死的。

一天下午，他在那里喝茶，不知是不是曾约会了人，突然的有一个凶手走上楼，向他开了一枪。他倒在椅上死去。凶手下楼逃走，谁也不敢追他。但在门口，被一个捷克青年遇到了，抱住了不放，他又开了一枪，把那位见义勇为的异国人也打死了。

我从此不再踏进这家咖啡馆；有一种异样的伤感与悲愤抓住了我，使我不再有喝午茶的闲情逸致。

我也从此不忍常坐于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从东走，在车窗上，可以望得见大华路口湛恩先生成仁的地方，也要经过那家咖啡馆，似旭先生的被刺的所在，处处触目伤心！岂止是“车过腹痛”而已！

湛恩、似旭二先生死后，我们的国际宣传的工作便松懈得多了，但那个地下工作的团体还是健在着，还继续的活动了三四年，一点也不曾退却，不曾忽略过一件小事或大事。集合了那末方面广大而复杂的人物在一起，经常的开着会，做着不少的事业，却始终不曾为敌人和敌人的走狗们所发觉，所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团体的分子的健全和机构的严密。也不能不相信：那一边虽然有少数的“为虎作伥”的汉奸们在跳梁，但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是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永远不死的前仆后继的精神的朋友！

四 野 有 饿 殍

乞丐到处都有，而上海尤多，职业的乞丐是有组织的，收入相当可观，决不会饿死。非职业的乞丐，象黄包车夫的家属，女人孩子们，偶然作着这一行"生意"，找些意外的收入，那也是决不会挨饿的。但从"八一三"抗战以后，乞丐的数量一天天的增多，许多非职业的乞丐也都变成了职业的。尽有向来饱食暖衣的人也沦入了乞丐群中。他们竞争得异常激烈，而肯"布施"的人却是那样的少——一天天的少下去。原因是"施舍者"群自己也多半陷在"朝不保夕"的情形之下，如何能够再施舍别人呢。

日本人向世界夸口说，北平的乞丐已经肃清了，市容很整洁。但从北平来的人告诉我们：乞丐在那城市里根本不能生存；有乞的，没有舍的。沦入乞丐群的人，不到几天，或十几天便都饿死了。

上海的情形也是如此。"饿殍"在一天天的增加。

中产阶级在战前吃惯杜米饭的，渐渐的改吃洋籼米，改吃面粉制品，改吃杂粮。本来是两餐吃饭，一餐吃粥的，渐

渐的改作两餐粥一餐饭了。改作两餐小米粥或绿豆粥，红豆粥之类，一餐面“疙瘩”，或面条子，或南瓜饼之类了。敌人“以战养战”，把江南产米区的米，香糯雪白的米，全都囊括而去。剩下的，小部分喂养着汉奸，极小部分才轮到老百姓头上。老百姓吃的是他们所不屑吃的碎米，发了臭的腐米，一半杂了糠粉的极坏的籼米，后来，爽爽快快的便连米粒儿也不见，除非用大价钱在黑市上搜求。

农人们自己吃不到自己种的米，应该吃米的老百姓们吃不到向来吃惯了的米，这米，一粒粒，一颗颗，雪白肥大的，全都经由汉奸们的手，堆到敌人的仓库里去。

有一天，我在霞飞路的一家商店窗口，见到一大批宣传画片，有几幅题着“满洲——东亚的谷仓”的，表现着满车满地的一袋袋的粮食，愤怒使我的脸涨红，我的双眼圆睁着，我想大声疾呼道：不错“满洲”是谷仓，可惜在那里的人，种稻的人却全都吃不到米粮，只有那批侵略者才有份大量的恣意的享用着。

听说，在那边，中国人是不许吃米的；即做着汉奸也不成。家有藏米的人都偷偷的吃着。儿童们上学，日本教师们突然的问道：你们昨天吃的什么东西？有的说杂粮，也有的说白米饭。第二天，说吃白米饭的儿童的家里却被抄家了，把藏的白米全都车了去，还把主人带了去治罪。从此以后，某家的人如果要吃大米饭，——这当然是万分之一中的“幸运者”——便遣开了或摒除了儿童们才吃。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汉奸到一个日本人家里吃饭，喝醉

了酒，在火车上呕吐了。被发现在呕吐物里有白米饭粒，立即把他逮捕了，追问下去，连那请客的日本人也受了处分。白米饭在东北三省是不许中国人吃的，虽然种稻的是中国人！

在北平，南京的伪组织里，也规定着那一等官吏吃那一种米。例如特任官可吃特号杜米，二三等的职员只好吃二等米之类。老百姓们呢，根本不配有米吃！说是实行配给制度，其实配给米的影子是难得见到的。

上海人的生活也不见得好。所以，向来乞丐们在家家后门口可以拿得到的残羹剩饭，渐渐的肯施舍的人少了，渐渐的成为绝无仅有的了。一家人家难得吃一顿饭，那里还会有东西剩下，就是剩下一碗半碗饭的，也都要留着自己吃，如何舍得布施呢。

上海的乞丐一天天的多，失业的人川流不息的加入这一群里，但也随"生"随灭。他们活不了多久。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他们突然的减少，多半是很快的便饿死。

饿肚子的人有多少痛苦，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所不会了解的。但每天听着街头"饿杀哉"那惨绝人寰的声音，谁的心头不荡着一股怨气，一腔悲愤，一缕沉重的郁恨！这是我们的敌人驱赶他们到这条"饿杀"的路上去的。

"战前"的乞丐呼喊求乞的声音是宏亮实大的，有种种的诉说，种种的哀婉之辞，种种的特别的专门的求乞的"术语"。但在这些时候，他们，饿了几天肚子的人，实在喊叫不出什么乞怜求悯的话了，只有声短而促，仿佛气息仅存的

“饿杀哉！”一句话了。

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的在扶墙摸壁的走着，口里低低的喊道：“饿杀哉！”“饿杀哉！”我不忍闻的急走过去，我没有力量帮助他。就在那一天，或第二三天，那战抖着的双腿一定会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的，成为一个无名的“饿殍”，战争所产生的“饿殍”。

这样的“饿殍”天天在街头发见，天天在不断的倒毙下去。

我硬了心肠走开去，转避了眼睛不敢去看他们，但我咬紧了牙关：这笔账是要算在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侵略者的头上的。

五 鹈 鹕 与 鱼

夕阳的柔红光，照在周围十余里的一个湖泽上，没有什么风，湖面上绿油油的象一面镜似的平滑．一望无垠的稻田。垂柳松杉，到处点缀着安静的景物．有几只渔舟，在湖上淀泊着。渔人安闲的坐在舵尾，悠然的在吸着板烟。船头上站立着一排士兵似的鹈鹕，灰黑色的，喉下有一大囊鼓突出来．渔人不知怎样的发了一个命令，这些水鸟们便都扑扑的钻没入水面以下去了．

湖面被冲荡成一圈圈的粼粼小波．夕阳光跟随着这些小波浪在跳跃。

鹈鹕们陆续的钻出水来，上了船．渔人忙着把鹈鹕们喉囊里吞装着的鱼，一只只的用手捏压出来。

鹈鹕们睁着眼望着．

平野上炊烟四起，袅袅的升上晚天．

渔人拣着若干尾小鱼，逐一的抛给鹈鹕们吃，一口便咽了下去．

提起了桨，渔人划着小舟归去．湖面上剩着一条水痕。

鸦鹏们士兵似的齐整的站立在船头。

天色逐渐暗了下去。湖面又平静如恒。

这是一幅很静美的画面，富于诗意；诗人和画家都要想捉住的题材。

但隐藏在这静美的画面之下的，却是一个残酷可怖的争斗。生与死的争斗。

在湖水里生活着的大鱼小鱼们看来，渔人和鸦鹏们都是敌人，都是蹂躏他们，致他们于死的敌人。

但在鸦鹏们看来，究竟有什么感想呢？

鸦鹏们为渔人所喂养，发挥着他们捕捉鱼儿的天性，为渔人干着这种可怖的杀鱼的事业。他们自己所得的却是那末微小的酬报！

当他们兴高采烈的钻没入水面以下时，他们只知道捕捉、吞食，越多越好。他们曾经想到过：钻出水面，上了船头时，他们所捕捉、所吞食的鱼儿们依然要给渔人所逐一捏压出来，自己丝毫不能享用的么？

他们要是想到过，只是作为渔人的捕鱼的工具，而自己不能享用时，恐怕他们便不会那末兴高采烈的在捕捉在吞食罢。

渔人却悠然的坐在船梢，安闲的抽着板烟，等待着鸦鹏们为他捕捉鱼儿。一切的摆布，结果，都是他事前所预计着的。难道是“运命”在播弄着的么，渔人总是在“收着渔人之利”的；鸦鹏们天生的要为渔人而捕捉、吞食鱼儿；鱼儿们呢，仿佛只有被捕捉，被吞食的份儿，不管享用的是鸦鹏们或

是渔人。

在人间，在沦陷区里，也正演奏着鹈鹕们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把戏。

当上海在暮影笼罩下，蝙蝠们开始在乱飞，狐兔们渐渐的由洞穴里爬了出来时，敌人的特工人员（后来是‘七十六号’里的东西），便象夏天的臭虫似的，从板缝里钻出来找“血”喝。

他们先拣肥的，有油的，多血的人来吮、来咬、来吃。手法很简单：捉了去，先是敲打一顿，乱踢一顿，——掌颊更是极平常的事——或者吊打一顿；然后对方的家属托人出来说情，破费了若干千万，喂得他们满意了，然后才有被释放的可能。其间也有清寒的志士们只好挺身牺牲．但不花钱的人恐怕很少。

某君为了私事从香港到上海来，被他们捕捉住，作为重庆的间谍看待。囚禁了好久才放了出来。他对我说：先要用皮鞭抽打，那尖长的鞭梢，内里藏的是钢丝，抽一下，便深陷在肉里去；抽了开去时，留下的是一条鲜血痕。稍不小心，便得受一掌、一拳、一脚．说时，他拉开裤脚管给我看，大腿上一大块伤痕，那是敌人用皮靴狠踢的结果．他不说明如何得释，但恐怕不会是很容易的。

那些敌人的爪牙们，把志士们乃至无数无辜的老百姓们捕捉着，吞食着。且偷、且骗、且抢、且夺的，把他们的血吮着、吸着、喝着。

爪牙们被喂得饱饱的，肥头肥脑的，享受着有生以来未曾

享受过的“好福好禄”．所有出没于灯红酒绿的场所，坐着汽车疾驰过街的，大都是这些东西．

有一个坏蛋中的最坏的东西，名为吴世宝的，出身于保镖或汽车夫之流，从不名一钱的一个街头无赖，不到几时，洋房有了，而且不止一所；汽车有了，而且也不止一辆；美妾也有了，而且也不止一个．有一个传说，说他的洗澡盆是用银子打成的，金子熔铸的食具以及其他用具，不知有多少．

他享受着较桀纣还要舒适奢靡的生活。

金子和其他的财货一天天的多了，更多了，堆积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其数．都是从无辜无告的人那里榨取偷夺而来的．

怨毒之气一天天的深；有无数的流言怪语在传播着．

群众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吴世宝这三个字，成为最恐怖的“毒物”的代名辞．

他的主人（敌人），觉察到民怨沸腾到无可压制的时候，便一举手的把他逮捕了，送到监狱里去．他的财产一件件的被吐了出来．——不知到底吐出了多少．等到敌人，他的主人觉得满意了，而且说情的人也渐渐多了，才把他释放出来．但在临释的时候，却嗾使猘狗咬断了他的咽喉．他被护送到苏州养伤，在受尽了痛苦之后，方才死去．

这是一个最可怖的鹈鹕的下场．

敌人博得“惩”恶的好名，平熄了一部分无知的民众的怨毒的怒火，同时却获得了吴世宝积恶所得的无数掳获物，

不必自己去搜括.

这样的效法喂养鹈鹕的渔人的办法，最为恶毒不过. 安享着无数的资产，自己却不必动一手，举一足.

鹈鹕们一个个的上场，一个个的下台. 一时意气昂昂，一时却又垂头丧气.

然而没有一个狐兔或臭虫视此为前车之鉴的. 他们依然的在搜括、在捕捉、在吞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却是为了他们的主人.

他们和鹈鹕们同样的没有头脑，没有灵魂，没有思想. 他们一个个走上了同样的没落的路，陷落在同一的悲惨的运命里. 然而一个个却都踊跃的向坟墓走去，不徘徊，不停步，也不回头.

六　汉奸是怎样造成的

我为了暨大招生的事，到过香港一趟，住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因为教育部驻港办事处附设在蔚蓝书店里，我不得不常常到那边去，有时为了收寄信件，有时为了有事要接头。

这时在蔚蓝书店里办公的，有林柏生、梅思平、朱朴之、樊仲云几个人。除了林柏生，其他的人都很熟悉。

他们天天在蔚蓝书店会面，没有什么公可办，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发发牢骚，骂骂人，成了习惯。他们都是自命为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仿佛国家亏待了他们什么的。虽然他们各有"使命"在香港，但好象都未能满其所欲。抗战正在"白热"的时候，然而他们不谈那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自己的切身的事。

有一天，他们谈起，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谈相的人很高明，他们都曾找他相过，说的话很灵验。

"你何妨也去试试看呢？"

我摇摇头，并不去管理他们。"不疑何卜！"

再有一天，一位朋友，在某军里服务的，经过香港。他说，会相面。于是，他们这一批人，个个都要他相相。

他们说的什么“眉毛运”，“鼻头运”等等，我一句也听不懂。

他说，某某人近五十岁正走运，应该可以发达，某某人便大为高兴。

他说，某某人现正“走”着某某运，他也十分的有兴头。

“你为什么不也来相一下呢？”又是一次的邀请。

我实在觉得厌恶极了！我忍耐不住，便正颜厉色的说道：“为什么要算什么命，看什么相呢？我们国家民族正在与敌人作生死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命与国家的运命是分不开的。国家胜利了，我们的运命当然是不会坏的；万一不幸抗战失败了，我们还会有什么好运可走呢？”

他们默默的不作一声。

我自觉做了一次傻事。为什么要对他们讲这种大道理呢？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着卖国的勾当，所以才会那样的“患得患失”。要是知道一点风声，也许把“话”还要说得凶些。

过了几天，李圣五到旅馆里找我。谈了一会，他也是满肚子的牢骚，把那些执政的人说得一文不值。那时，他也正在失意的时代，方由外交部某官“下台”，重进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

伪组织在南京“成立”的时候，那一批失意的“官僚”，便都到了南京来，走马上任，过其“官瘾”．

我到这时候，方才恍然大悟，明白他们所以要不时的“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原因．

因之，我也顿时恍然大悟，凡是患得患失，时时要求神告佛，看相问卜的，到底那是些什么人．

官僚政治，在中国已是根深蒂固，不易拔除，象是一座大洪炉，凡投到这大洪炉里的，不问是什么顽铁，无不立被炼成“绕指柔”的精钢；除非他本是一颗金刚钻一类的人物，才不会“同流合污”．要是曾一日为官，似乎终身便带些官脸、官气、官味．据说，曾经做过“总长”的人，这个头衔便终身不会除脱开去．有一位素来可敬的学者，不幸“出山”过一次，便被人称为“总长”“总长”的直到于死．听人说，他自己也并不以此称号为忤．

林、梅、李诸逆，都是曾经尝过“官”趣的．所以一旦下野或“还我初服”，便有些不甘寂寞，静极思动起来，无时无刻，都想要重行登台．此路走不通，便要走他路；大道走不通，便要走小路；此处不留人，便别求留人处．他们所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富贵荣华，以及居室、姬妾、饮食等等的享用．

这样的“官僚们”，天天都在寻找“知己”，寻找“用我者”，寻找他们的主子．只要主子肯垂青到他们，置之左右，饵以高官厚禄，便会鞠躬尽瘁，为其所用，那主子是何等样人，他们却不想去问一下的．

得意时恣意享受，失意时求神问卜，便是他们生成的“面相”．一日无“君”，便觉得栖栖惶惶，寝食难安．国家民族的存亡，老百姓们的生死，饥馑，与他们根本痛痒无关．他们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宁愿做汉奸，受万人唾骂，受万世唾骂，却不肯寂寞自安．

这便是汉奸之所以造成的原因，也便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深厚的流毒所聚之结果．

官僚主义不从根铲尽，汉奸是永远不会绝迹人间的！

七 最后一课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

"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象殉难者

的最后的晚餐，象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

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那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象钢铁铸成似的坚固，象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八 烧 书 记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毁”“抽毁”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

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检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检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切怛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但有谁能够说明那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那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毁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

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象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罢？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箧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罢。”孩子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罢，下回去买好一点的书给你。”

在这时侯，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罢。"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但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罢。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 想 到 这 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治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 的 书 籍 、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

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毁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销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许多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象《文汇年刊》之类，我

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九 “封锁线”内外

“生”与“死”，刻划得像黑白画似的明显清晰的同在着：这一边熙熙攘攘，语笑欢哗，那一边凄凉冷落，道无行人；这一边是生气勃勃，那一边是死趣沉沉；这一边灯火通明，摊肆林立，那一边家家闭户，街灯孤照；这一边是现实的人间，活泼的世界，那一边却是“别有天地”的“黄泉”似的地狱了。

“生”与“死”，面对面的站立着，从来没有那末相近，那末面对面的同时出现过。

他们之间相隔的不过是一堵墙，一道门，甚至不过一条麻绳，或几支竹架，或一道竹篱笆。惨痛绝伦的故事就在那一堵墙，一道门，或一条麻绳的一边演出；而别一边却在旁观看，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这封锁线，在上海，有大小圈之分；大的一圈包括四郊在内，小的一圈包括旧公共租界及旧法租界。临时的更小的封锁线却时时的在建立着，也不时的被撤除。

我没有进出过那大小两封锁线。听说，进出口的地方，

都有敌兵在站岗，经过的人一定要对他脱帽行礼。无故的被扣留，不许通过，无故的被殴辱，被掌颊，拳打，脚踢，被枪柄击，甚至，被刺刀杀死的事，时时发生。有一次，一个大雪天，一个归家的旅人，偷偷的越过竹篱笆。当夜，不曾被发觉。第二天，巡逻的敌兵经过，跟循着雪地上的足迹，到了他家，把这人捉住，不问情由的当场斩首，悬在竹篱笆上示众。

米贩子被阻止，被枪杀的故事，听到的更多。一个车夫告诉我：他经过封锁线时，眼见一个十三四岁的童子，负着一小袋米，被敌兵把米袋夺下，很随便的把刺刀戳进这童子的肚上。惨叫不绝。没有一个人敢回头看一眼。后来，这半死的童子被抛进附近的一条小河里去了。

更惨的是，被刺刀杀而未死的人，一直被抛在地上。任他喊叫着多少天才死去。没有一个人敢去救，敢去问一声讯。

南市某一个地方被封锁，经过了好久的时间才开放。封锁线内，饿死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人敢于越线而逃出。有人向线内抛进馒首一类的食物，但也不能救活多少人。默默的被拦在‘死亡线’内；默默的受饥饿而死。这不可思量的可怕的耐受苦难与厄运的精神啊！

为了一件小小的盗劫案或私人暗杀案，也往往造成敌人把上海最繁华地带封锁了十天八天的。大新公司至先施公司的一段，便这样的被封锁了不止二次三次。有种种最残酷、最恐怖的传说流行着。

多少人不知怎样的便失踪了；多少人便无缘无故的被饿

死在街衢间了！

我亲自看见一幕蒲石路被封锁的情形。

在一个夜间，有一个住在那个地方的伪军军官被暗杀。这个事件一发生，那一带立刻便被封锁。出事的地点的四周都用一根麻绳拦住。居民们总有十万人以上被阻止不能进出。访友进去的，无端的不能归去了；出外办事的人，无端的到了街口，不得其门而入。最惨的是：小贩们和人力车夫们，只好在冷清清的街上徘徊着，彷徨无措，茫然的睁着大眼睛，望着封锁线外，一筹莫展。最后，还被赶到小街里去。那恐怖失神的一双双眼睛，简直象牵到屠场去的牛群。我不敢多看，也不能多想象。我只有满腔的愤怒。

这种封锁，平常总在十天左右便开放。开放的条件据说是若干百万的私赂。

临时的封锁，自二三小时至半天左右的，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

有一天，我到三马路的一家古书铺去。已可望见铺门了，突然的叫笛乱吹，一队敌人的宪兵和警察署的汉奸们，把住了路的两头，不许街上的任何一个人走动。古书铺里的人向我招手，我想冲过街去，但被命令站住了。汉奸们令街上的人排成了两排，男的一边，女的一边；各把市民证执在手上。敌兵荷枪站在那里监视着。汉奸们把一个个的人检查，盘问着。挟着包袱或什么的，都一一的被检查过。发现了几个没有带市民证的，把他们另外提到一边去，开始严厉的盘诘。

"市民证忘记了带出来。"

拍，拍，拍的一连串的挨了嘴巴，或用脚来乱踢一顿。

一个人略带倔强的态度，受打得格外利害。一下下掌颊的响声，使站在那一边的我，捏紧了拳头，涨红了脸，心腔中的血都要直喷出来。假如我执有一支枪啊！……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穿着黑色短衣裤的家伙或东西，喂得胖胖的，他的肥硕的手掌，打人打得最凶；那“助纣为虐”的东西，实在比敌人还要可恶可恨十倍！

好容易审诘完毕，又是一声长长的叫笛一响，那一批东西向北走，又向别的地域干着同样的把戏去了。

被封锁住的人们，吐了一口长气，如释重负。

我走进那家古书铺，双手还因受刺激而发抖着。

这样的情形，天天有得遇到。

早上出外做事的人，带着自己的生命和运命同走，不知晚上究竟能不能回家。等到踏进了自己家门口，才确切的知道，这一夜算是他自己的了。

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谁的生命会有保障呢？

这样的封锁线，天天不同的在变换着。谁也不能料到，今天在封锁线外的，明天或后天会不会被圈划进封锁线内去，默默的受苦受难，默默的受饥饿而死去。

在敌人的后方，生命的主权是不握在自己手里的。随时随地，最可怖的运命便会降临到他的，和他的一家的身上。

“生”和“死”，那间隔是如此的相近啊！

一〇 坠楼人

太阳和暖的晒在街上。行人熙来攘往，街车疾驰而过，一片的大都市的清晨的热闹的气象。仿佛谁都不知道这个大都市曾经经过了一番绝大的变动。

唯一看得出来的变化是，一所红砖的大房子，曾经在门口悬挂着星条旗的，如今换上了两面绝巨的旭日旗，旗的一角，几要拖在地面上。有一个敌兵荷枪立在门口守望着。行人们都远远的绕到对街走过。

离开这房子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大厦，向来是许多字号行庄在那里办公，进进出出的人不少。但近来忽然的减少起来。进进出出的别是一批人物。时时有土黄色的军用车停在前面。

穿海军装和陆军服的官兵们不断的在那里进进出出。谁也不知道那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谁也不曾到里面去过，虽然那里面有许多人从前是很熟悉的。

正在清晨，行人车辆都很热闹的时候，突然的有一团彩霞似的东西，从那所大厦上面的一个窗口倒掷了下来，好笨

重的落在水门汀的行人道上。桃红色的鲜血飞溅了一地，那落下来的却是一个人。当时便昏倒，不呻吟一声的死了去。这是一个妙龄的女郎，穿着得很华丽，一身最时髦的装束，处处都可以看得出她是十分的雍容华贵。

群众们拥了上去看。但过了几分钟，敌兵们便走了来，把他们驱散。谁也不知道这坠楼人是谁家的眷属，为了什么事而坠楼，或她的坠楼是被推落的还是出于自杀的。

当时在那一带办公的人们，目睹着这幕悲剧，曾纷纷籍籍的传说着。但过了几天，他们便都忘记了这事，也不再有什么人提起她来。

在报纸上找不出那一段消息和故事来。

这惨绝人寰的故事，和其他更惨酷的故事，都是同样的出于野兽般的敌兵们的手所表演着的。

这位妙龄女郎，听说是姓贝，一个大商人的儿媳妇。她有一个保管箱在一家外商银行里。

当敌兵占领了租界后，他们出了布告，要每个保管箱的主人都要到各外商银行里，会同他们开箱查验箱内的东西。

这位女郎带了钥匙到银行里去。她的保管箱里，多的是金饰和钻石之类，但没有一点违禁之物。

那个监视她的“兽”类，却动了心，为了物，也为了人，便不问情由的将她带到了那座大厦里去，将她囚禁于某一个房间里。

不知是一天或两天或仅半天，也不知她曾经遭遇到什么样的待遇，总之，她感觉到绝望和恐惧，便趁着监守者的一

时疏忽，奋身从窗口跳到楼下自尽了。

这位有烈性的妇人，应该是受褒扬的，却没没无闻的不曾有人提起过。——这比绿珠还惨痛的一个故事，一个兽性的敌人所创造成功的悲剧，一个国家在抗战中受屠杀、伤害的人物的壮烈的牺牲。

这血仇，这牺牲是应该由我们来报复的。

如果有什么“胜利勋章”的话，那勋章是应该首先献给一大批的死难者们的，而她也是其中之一。

一一　从“轧”米到“踏”米

江南人的食粮以稻米为主．“八一三”后，米粮的问题，一天天的严重起来。其初，海运还通，西贡米、暹罗米还不断的运来．所以，江南的米粮虽大部分已为敌军所控制，所徵用，而人民们多半改食洋米，也还勉强可以敷衍下去。其时米价大约二十元左右一担。但平民们已有亟亟不可终日之势。“工部局”开始发售平价米．平民们天一亮便等候在米店的门口，排了队，在“轧”米．除了排队上火车之外，这“轧”米的行列，可以说是最“长”最齐整的了，穿制服的人，“轧”米有优先权．他们可以后到而先购，毋须排队．平民们都有些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

有些维持“秩序”的人，拿粉笔在每个排队的人的衣服上写上了号码．其初是男女混杂的，后来，分成了男女两队。每一家米店门前，每一队的号码有编到一千几百号的．有的小贩子，“轧”到了米，再去转卖．一天可以“轧”到好几次米，便集起来到里弄里去叫卖．以此为生的人很不少。

后来，主持平卖的人觉得这方法不好，流弊太多，小贩子

可以得到米，而正当的籴米的人却反而挤不上去，便变更了方法．不写号码，而将每一个购过米的人的手指上，染了一种不易褪色的紫墨水。这一天，已染了紫色的人便不得再购第二次米。

但这方法也行了不久。“工局部”所储的米，根本不能维持得很久。洋米的来源也渐渐的困难起来。米价飞跃到八十余元一担。

“轧”米的队伍更长了，常常的排到了一两条街。有的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坐在地上。有的带了干粮来吃。小贩们也常在旁边叫卖着大饼油条一类的充饥物。开头，“轧”米的人，以贫苦者为多，以后，渐有衣衫齐整的人加入。他们的表情，焦急、不耐、忍辱、等候、麻木、激动，无所不有，但都充分的表示着无可奈何的忍受。为了太挤了，有的被挤得气都喘不过来。为了要“活”，什么痛苦都得忍受下去。有执鞭子或竹棒的人在旁，稍一不慎，或硬“轧”进队伍去，便被打了出去。有的，在说明理由，有的，只好忍气吞声而去。强有力的人，有时中途插了进去，后边的人便大嚷起来，制止着；秩序顿时乱了起来。为了一升米，或两升米，为了一天的粮食，他们不能不忍受了一切从未经过的“忍耐”“等候”与“侮辱”。

米价更涨了。一升米的平售价值，也一天天的不同起来。然而较之黑市价格还是便宜得多，所以“轧”米的行列，更加多更加长。

有办法的人会向米店里一担两担的买。然已不能明目张

胆的运送着了。在黑夜里，从米店的后门，运出了不少的米。但也有纠纷，时有被群众阻止住了，不许运出。

最大的问题是'食'，是米粮。无办法的人求能一天天的"轧"得一升半升的米，已为满足；有办法的人储藏了十担百担的米，便可安坐无忧。平民们食着百元一担，或十元一升的米时，有办法的人所食的还是八元十元一担的米。

有许多"轧"米的悲惨的故事在流传着。因为"轧"不到米，全家挨饿了几天，不得不悬梁自尽的有之。因为"轧"米而家里无人照料，失了窃，或走失了儿女的有之。因为"轧"米而不能去教书，或办事，结果是失了业的，也有之。携男带女的去"轧"米，结果还是空手而回。将旧衣服去当了钱，去"轧"米，结果，那仅有的养命的钱，却在排队拥挤中为掱手所窃去。

大多数的人家，米缸都是空的，米是放在钵里，罐里，或瓶里，却不会放在缸里的。数米为饭的时候已经到了。有的人在计数着，一合米到底有几粒。他们用各种方法来延长"米"的食用的次数。有的渗合了各种的豆类，蚕豆、红豆、绿豆、黄豆，有的与山薯或土豆合煮。吃"饭"的人一天天的少了。能够吃粥的，粥上浮有多半的米粒的，已是少数的人家了。

如果有画家把这一时期的"轧米图"绘了出来，准比流民图还要动人，还要凄惨。那一张张不同的憔悴的面容，正象征着经历了许多年代的痛苦与屈辱的中国人民们的整个生活的面容。

到了后来，“工部局”的储粮空了，同时，敌人们的压力也更大，更甚了，便借着实行‘配给制度’的诱惑力，开始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百数十年来向来乱丝无绪的“租界”的户口，竟被他们整理得有条有理。

所谓“配给制度”，便是按着户口，发给“配给证”，凭证可以购买白米及其他杂粮和日用品。开头，倒还有些白米配给出来。渐渐的米的“质”“江河日下”了；渐渐的米的“量”也一天天的少下去了；渐渐的用杂粮来代替一部分的白米了。米的“质”变成了“糠”多“米”少，变成了泥沙多，米质有臭味，不能入口，变成了空谷多于米粒。这些，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入口，所不欲入口的，所以很慷慨的分了一部分出来。至于我们所生产的香糯的白米呢，那是敌人们的军粮，老百姓们是没有份吃到的。

有几个汉奸，勾结了管理军粮的敌人们，窃出了若干白米或军粮，在黑市上卖了出来。上海人总有半年以上能够在黑市上买得到真正的白米或杜米。那不能不归功于那些汉奸们的作弊之功——从老虎嘴里偷下了一小部分的肥肉出来。后来，这事被他们发现了，两个汉奸，侯大椿和胡政，便被他们枪决。从此以后，白米或杜米，在市面上便更少见到了。“一二·八”珍珠港事变以后，海运完全断绝了，连日本本土的白米也要“江南”地方来供给，白米的来源，便更加艰难，稀少起来。

上海区的人民们，如果有力量，不愿吃杂粮或少吃杂粮的，只好求之于少数的米贩子，那便是所谓“踏”米的人们。

"踏"米的人，不过是一个代表的名辞，指的便是那批用自行车偷偷的从敌人的封锁线上，载运了少数米粮过来的人。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做着这种黑市交易．其他妇孺们和老年的人们也常常带了些米粮来卖．身上穿了特制的"背身"，"背身"前后面都有的，其中便储藏着白米，很机警的偷过了敌人的"检问所"。——其实，还是用金钱来买"过"的居多．他们常常的发生"麻烦"，最轻的处罚是将食米充公．封锁线的边缘上常见有许多的"没收"的白米堆积着．有的是"没收"后还被"打"被"罚跪"。遇到敌人们不高兴的时候，便用刺刀来戳毙他们。如此遭害的人很不少。友人程及君曾绘了一幅踏米图，那幅图是活生生的一幅表现得很真切的凄惨的水彩画，是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的烙印．

为了食米的输入一天天的艰难起来，敌人们的搜括一天天的加强加多起来，米价便发狂的飞涨着．从伪币一千元两千元一担，到四千元，八千元一担．后来便是一万元，五万元的狂跳着．最后，竟狂跳到一百万元左右一担；最高峰曾经到过二百万一担的关口．平民们简直没有吃到"白米"的福气．连所谓"二号米"，"三号米"也难得到口．许多人都被迫改食杂粮，从面粉到蚕豆、山薯，只要是能够充饥的东西，没有不被一般人搜寻着．饭店里也奉命不许出卖白米饭；有的改用面食；有的改用所谓"麦饭"．白米成了最奢侈的、最珍贵的东西．"配给制度"也在无形中停顿了．——从半个月配给一次，到一个月两个月配给一次，直到了"无形停顿"为止．

食粮缺乏的威胁,不仅使一般平民们感受到,即有力食用白米者们也都感受到了。肉和鱼和蔬菜还有得见到,白米却都到了敌人们的“仓库”里去了.前些时,听说烟台的人请客,食米要自己随身带去.江南产米区的人们,这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历史上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皇帝,遇到荒年,饥民遍野,他提议说,“何不吃肉糜?”这时,倒的确有这样的“事实”了.吃肉糜易,吃白米饭却难。

假如胜利不在八月里到来的话,在冬天,饿死的人一定要成坑成谷的.然而江南产米区并不是没有米.米都被堆藏在敌人的仓库里,一包包,一袋袋堆积如山,任其红腐下去.他们还将米煮成了“饭”,做成了罐头,一罐罐堆积着,以备第二年,第三年的军粮.

什么都被掠夺,但食粮却是他们主要的掠夺的目的物.我曾经过几个大厦,那里面的住户都已被赶了出去,无数的卡车,堆载着白米,往这些大厦里搬运进去.雪白香糯的米粒,漏得满地,这不是白米!然而沦陷区的人民们是分润不到一粒的!德国人对占领地的许多欧洲人说,“德国人是不会饿死的;你们不种田,不生产,饿死的是你们;最后饿死的才是德国人.”这话好不可怕!日本人虽然没有公开的说这句话,然而他们实实在在是这样做着的.

假如天不亮,我们是要首先饿死了的!

好不可怕的一场噩梦!

一二 韬奋的最后

韬奋的身体很衰弱，但他的精神却是无比的踔厉。他自香港撤退，历尽了苦辛，方才到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在那里住了一时，还想向内地走。但听到一种不利于他的消息，只好改道到别的地方去。天苍苍，地茫茫，自由的祖国，难道竟拒绝着他这样一位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的子孙么？

他在这个时候，开始感觉到耳内作痛，头颅的一边，也在隐隐作痛。但并不以为严重。医生们都看不出这是什么病。

他要写文章，但一在提笔思索，便觉头痛欲裂。这时候，他方才着急起来，急于要到一个医诊方便的地方就医。于是间关奔驰，从浙东悄悄的到了上海。为了敌人们对于他是那样的注意，他便不得不十分的谨慎小心。知道他的行踪的人极少。

他改换了一个姓名，买到了市民证，在上海某一个医院里就医。为了安全与秘密，后来又迁徙了一二个医院。

他的病情一天天的坏。整个脑壳都在作痛，痛得要炸裂

开来，痛得他终日夜不绝的呻吟着。鼻孔里老淌着脓液。他不能安睡，也不能起坐。

医生断定他患的脑癌，一个可怕的绝症。在现在的医学上，还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夫人跟随在他身边。医生告诉她：他至多不能活到二星期。但他在病苦稍闲的时候，还在计划着以后的工作。他十分焦急的在等候他的病的离体。他觉得祖国还十分的需要着他，还在急迫的呼唤着他。他不能放下他的担子。

有一个短时期，他竟觉得自己仿佛好了些。他能够起坐，能够谈话，甚至能够看报。医生也惊奇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病理上被判定了死刑和死期的人怎么还会继续的活下去，而且仿佛有倾向于痊愈的可能。医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时期，他谈了很多话，拟定了很周到的计划。但他也想到，万一死了时，他将怎样指示他的家属们和同伴们。他要他的一位友人写下了他的遗嘱。但他却是绝对的不愿意死。他要活下去，活下去为祖国而工作。他想用现代的医学，使他能够继续的活下去。

他有句很沉痛的话，道：“我刚刚看见了真理，刚刚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难道便这样的死了么？”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真实的需要生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祖国。

他的精神的力量，使他的绝症支持了半年之久。

到了最后，病状蔓延到了喉头。他咽不下任何食物，连

流汁的东西也困难。只好天天打葡萄糖针，以延续他的生命。

他不能坐起来。他不断的呻吟着。整个头颅，象在火焰上烤，象用钢锯在解锯，象用斧子在劈，用大棒在敲打，那痛苦是超出于人类所能忍受的。他的话开始有些模糊不清。然而他还想活下去。他还想，他总不至于这样死去的。

他的夫人自己动手为他打安眠药的针，几乎不断的连续的打。打了针，他才可以睡一会。暂时从剧痛中解放出来。刚醒过来的时候，精神比较好，还能够说几句话。但隔了几分钟，一阵阵的剧痛又来袭击着他了。

他的几个朋友觉到最后的时间快要到来，便设法找到我蛰居的地方，要我去看望他。我这时候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在上海和他的病情。

我们到了一条冷僻的街上，一所很清静的小医院，走了进去。静悄悄的一点声息都没有。自己可以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

我们推开病室的门，他夫人正悄悄的坐在一张椅上，见我们进来，点点头，悄悄的说道："正打完针，睡着了呢。"

"昨夜的情形怎样？"

"同前两天相差不了多少。"

"今早打过几回针？"

"已经打了三次了。"

这种针本来不能多打，然而他却依靠着这针来减轻他的

痛楚。医生们决不肯这样连续的替他打的，所以只好由他夫人自己动手了。

我带着沉重的心，走近病床。从纱帐外望进去，已经不大认识，躺在那里的便是韬奋他自己了。因为好久不剃，胡须已经很长。面容瘦削苍白得可怕。胸部简直一点肉都没有，隔着医院特用的白单被，根根肋骨都隆起着。双腿瘦小得象两根小木棒。他闭着双眼，呼吸还相当匀和。

我不敢说一句话，静静的在等候他的醒来。

小桌上的大鹏钟在的嗒的嗒的一秒一秒的走着。

窗外是一片灰色的光，一个阴天，没有太阳，也没有雨，也没有风。小麻雀在唧唧的叫着，好象只有它们在享受着生命。

等了很久，我觉得等了很久，韬奋在转侧了，呻吟了，脓水不断的从鼻孔中流出。他夫人用棉花拭干了它。他睁开了眼，眼光还是有神的。他看到了我，微弱的说道："这些时过得还好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挣扎出来的。

我说，"没有什么，只是躲藏着不出来。"

他大睁了眼睛还要说什么，可是痛楚来了，他咬着牙，一阵阵的痉挛，终于爆出了叫喊。

"你好好的养着病吧，不要多说话了。"我忍住了我要问他说的话，那么多要说的话。连忙离开了他的床前，怕增加他的痛楚。

"替我打针吧，"他呻吟的说道。

他夫人只好又替他打了一针。

于是隔了一会，他又闭上了眼沉沉睡去。

病房里恢复了沉寂。

我有许多话都倒咽了下去，他也许也有许多话想说而未说。我静静的望着他，在数着他的呼吸，不忍离开。一离开了，谁知道是不是便永别了呢？

“我们走吧，”那位朋友说，我才矍然的从沉思中醒来。我们向他夫人悄悄说声再会，轻轻的掩上了门，退了出来。

“恐怕不会有希望的了。”我道。

“但他是那末样想活下去呢！”那个朋友道。

我恨着现代的医学者为什么至今还不曾发明一种治癌症的医方，我怨着为什么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设法治愈了他的这个绝症。

我祷求着，但愿有一个神迹出现，能使这个祖国的斗士转危为安。

隔了十多天没有什么消息。我没有能再去探望他，恐怕由我身上带给他麻烦。

有一天，那位朋友又来了，说道：“韬奋昨天晚上已经故世了！今天下午在上海殡仪馆大殓。”

我震动了一下，好几秒钟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低了头，默默的为他志哀。

固然我晓得他要死，然而我感觉他不会死，不应该死。

他为了祖国，用尽了力量，要活下去，然而他那绝症却不容许多活若干时候。

他是那样的不甘心的死去！

我从来没有看见象他那样的和死神搏斗得那末利害的人。医生们断定了一二星期死去的人，然而他却继续的活了半年。直到最后，他还想活着，还想活着为祖国而工作！

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毅力！忍受着半年的为人类所不能忍受的苦，日以继夜的忍受着，呻吟着，只希望赶快愈好，只愿着有一天能够愈好，能够为祖国做事。

然而他斗不过死神！抱着无穷的遗憾而死去！

他仍用他的假名入殓，用他的假名下葬，生怕敌人们的觉察。后来，韬奋死的消息，辗转的从内地传出；却始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是死在上海的。敌人们努力的追寻着邹韬奋的线索，不问生的或是死的，然而它们在这里却失败了！它们的爪牙永远伸不进爱国者们的门缝里去！它们始终迷惘着邹韬奋的生死和所在地的问题。

到了今天，我们可以成群的携着鲜花到韬奋墓地上凭吊了！凭吊着这位至死还不甘就死的爱祖国的斗士！

一三　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

在昏雾的敌伪统治之下，具有正义感与民族意识的人士们有几个能够"苟全性命"的呢？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把那些敌人们当作"有理性"的"人"看待，结果却发现他们原来是一群兽，于是便殉难而亡。

其他不知名的死难者们更不知有多少。我们应该建立一座"无名英雄墓"来作永久的追念。

至于遭难被囚，幸而不死者，则在朋友们里，非常的多。有一天，在一位朋友的宴会上，在座的人，十个之中，有八个遭过难，受过敌伪的酷刑毒打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是幸免入狱受苦的人。

我自己不知怎样竟会逃过此厄；大半是要感谢遭难的朋友们的爱护，宁愿自己吃尽了苦，却绝对的不肯攀引出自己的同伴们出来。这种精神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假如说，我们这一次抗战的胜利不完全是幸致的话，那末，主要的致胜之因，要归功到这种"不屈"的烈士的，或民族的英勇的精神的。

上海撤守后，首先遭难的有王伍本君。王君是国立暨南大学的学生。不知什么缘故，敌人竟到校来捕捉他。他攀住扶梯不肯走，但终于被强力拖抱而去。至今不知下落。校方曾向警局告警，但敌人取出证件，证明王君是日籍的台湾人，他们乐得袖手旁观。后来听说，王君的被捕，是为了逃避兵役。祝福这位反战的英雄，不忘祖国的壮士，但愿他至今还无恙的生存着，能够目睹台湾之重入祖国的怀抱！

第二个遭难的是吴中修先生。他是暨大的训育主任，一位最正直无私的君子人。伪方屡次的要强迫他加入伪组织，他都严辞拒绝之。有一次，他步行到校办公，校门口有一部黑色的汽车停在那里。旁边有几个彪形大汉，一见他来，便捉住了他，要强拖他进汽车。他竭力的抵抗着，挣扎着，竟得挣脱了他们的捉捕，逃进校门。这时，围观的闲人们已经聚得很多，他们只好开了汽车逃去。据说，当时幸而他们未带手枪，否则，中修先生一定不会幸免的。

"一二八"后，许广平女士是朋友们中最早遇难被捕的。她和当时做地下工作的一个民众团体有很深的关系。但她咬紧了牙根，不吐露丝毫的消息给他们。她自己吃尽了苦，然而却保全了整个团体和无数的朋友们。——我也是其中的一人——她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头发白了许多。她是怎样的拚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同伴们！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华民族的女战士和女英雄！

夏丏尊先生无端的在一个清晨被捕了。他临走时，说："通知老板一声吧。"敌人们立刻迫着问老板是谁，于是章

雪村先生也因之连带的陷入魔手了。他们虽没有受刑，然而天天的审问，盘查是很不好受的。

雪村先生出狱后，曾示我以狱中所作数诗；其一云："日食三餐不费钱，七时早起十时眠。一瓯香饭抟云子，半钵新茶泼雨前。汤泛琼波红滟滟，盐霏玉屑碧芊芊。煤荒米歉何须急，如入桃源别有天。"其二云："一日几回频点呼，噎凄尼散哈栖枯。低眉敷座菩提相，伸手抢羹饿鬼图。运动憧憧灯走马，睡眠簇簇罐藏鱼。剑光落处山君震，虎子兼差摄唾壶。"其三云："执戈无力效前驱，报国空文触网罟。要为乾坤扶正气，枉将口舌折侏儒。囚龙姦凤衹常事，屠狗卖浆有丈夫。惭愧平生沟壑志，南冠亏上白头颅。"

他们出狱后，告诉我们说，经过这十多天的"非人生活"后，简直什么苦都可以吃得消。粗茶淡饭的生涯，不啻是人间天堂。

和他们同时"进去"的有好几十个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师们。听说他们吃了不少苦，不久，也都被释放了。

友人赵景深的夫人李女士也因友人的牵连而被捕了去。

杜纪堂先生的夫人赵女士，因为内地寄了一封信给杜先生，信壳上写了她的姓名，因此也被捕。她是笃信基督教的，在狱中默念天主，心里倒很宁静。她被威胁，被劝诱，但绝对的不肯说出杜先生的所在。杜先生得脱于难，连忙避到内地去。

柯灵先生很早的被敌伪所注意。敌人们常常找他谈话，但想利用他的线索，追究很多人。他不泄漏任何的事与人。有一天，我在一家茶室里和他遇到了。我向他招呼着，但他

暗中使一个眼色，我连忙的坐了下去，不作理会。原来他的隔座便有一个敌人的密探在着。最后，敌人们对他绝望了，便捕了去，用了种种的酷刑，要他招说。他紧闭着嘴，什么也不说。出来后，他告诉友人们说，受刑不住时，心无杂念，只拚一死；除了“妈呀”的喊着外，别无他话。

李健吾、孔另境先生和杨绛女士们都曾被捕，也都曾吃苦，但他们也都没有使同伴们牵连的被捕。敌人们迫胁着要他们开名单，他们所开的却都是绝不相干的人。

冯宾苻先生“进去”了不止一次。每次都很有幸的被盘问后便放出。最后一次，他们把他拖到一个池塘边上；池塘里放着蛇，蜈蚣，等等的毒虫，水有一人多深。他们说，他如果不招便要掷进这池塘里去。他坐在地上，他们用足踢，用手推，但他在草地上滚了开去，终得幸免于此难。后来，被释放后，总有一两个月，他的精神，还是惊恐不安，举止还是失常。

还有个朋友，无故被捕了去，经过一个月，被放了出来，头上的发通通的变白了，我几乎不认识他。

这些朋友们，遭了难，吃了苦，为了救全同伴们，宁愿自己牺牲；有多少的同伴们因此得以保全无恙；这精神是如何的伟大！

这些遭难的朋友们，只是我所知道的遭难人们中的最少数的人们；大多数的青年人们吃的苦也许更深，受的刑也许更酷更惨，然而为了祖国，他们忍受了一切。

多少人是失了踪，死了。多少人是变成残废了。

然而祖国终于是得救了！

一四　记吴瞿安先生

我们对于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志不旁骛，心无杂虑的人，应该特别的致敬意。自中国教育制度改革以来，这样诚笃忠恳的教员们，所在多有，但更多的却是借了做教员为“登龙之术”，为阶梯，为过渡，为暂时的安身之地，一有机会，便飞了开去。吴瞿安先生是一位终身尽瘁于教育事业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岗位。他从二十七岁（宣统二年）任职于存古学堂起始，在南京第四师范教了一年，在上海民立中学教了四年，在北京大学教了六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教了近五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两校兼教了两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了七年，直至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起来后，始避寇西迁，不复以舌耕为业。他自汉口转寓湘潭，再迁桂林，转至昆明，于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卒于云南大姚县李族屯，年五十六。没有多少人象他那样的专心一志于教育事业的。他教了二十五年的书，把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教书上面。他所教的东西乃是前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他专心一志的教词，教曲，而于曲，尤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

他的门生弟子满天下。现在在各大学教词曲的人，有许多都是受过他的薰陶的。

教词的人，在北方有刘毓盘先生；教曲的人却更少了。在三十年前，曲是绝学。王国维先生写过《宋元戏曲史》，写过《曲录》，但他不曾教过曲。他是研究“曲史”的，对于“曲律”一类的学问，似乎并不曾注意过。瞿安先生却兼长于“曲史”与“曲律”。他自己会唱“曲”，会谱“曲”。在今日，能谱“曲”的人恐怕要成为“广陵散”了。

二十多年前，我还不曾和瞿安先生相识，有一次，和几位朋友游天平山，前面有一只船，在缓缓的荡着，有一个人和着笛声在唱曲。唱得高亢而又圆润。一位朋友道：“瞿安先生在前面船上呢。”“是他在唱么？”“是的。”因为我们这只船也是缓缓的荡着的，始终没有追上，所以我们没有见面。

后来，我到南京去访“曲”，才拜访瞿安先生。我们谈得很起劲。又一次，我到苏州去找他，在他书房里翻书，见到了不少异书好曲。他从来不吝惜任何秘本。他很殷勤的取出一部部的明刊传奇来。我有点应接不暇。我们一同喝着黄酒，越谈越起劲。他胸中一点城府也没有，爽直而恳挚。说到后来，深以这“绝学”无后继者为忧。他说道：“我几个孩子，都不是研究曲子的。”言下仿佛“深有憾焉”似的。但我后来知道，他有一位世兄，也是会唱曲的。有人说他会使酒骂座。这不尽然。他喝了酒，牢骚更多是实在的。但并没有“狂书生”的习气。我们说起董康刻的《咏怀堂四种

曲》. 他说, "原本在我这里呢, 董刻妄改妄增的地方不少. 我一定要发其覆. "原本很模糊, 是很后印的本子了, 所以董刻本便大加改动. 我很高兴瞿安先生能够加以纠正. 可惜他后来始终没有动笔. 这本子不知乱后尚在人间否. 此志一定要有人完成他才好.

我向他借了好多明刊本传奇照了相, 还借了他的一批《周宪王杂剧》的原刻序跋, 这些序跋他印《奢摩他室曲丛》时还没有得到, 所以不曾印入, 他都慨然的允诺了. 如果没有他这一批序跋, 我对于《周宪王杂剧》的研究是不会完成的.

"一二八"倭变时, 他的《奢摩他室曲丛》三四集虽已印好, 却全部毁失, 连带的把他待印的若干珍贵曲本也都烧掉. 这不是金钱所能赔偿的. 事后他给我一封信道: "曲者不祥之物也. "可以说是"伤感"之至了! 然而他并不灰心. 有好曲, 他还是要收罗. 他见到我的唐英《古柏堂传奇》和《青楼韵语》, 都借了去抄. 他的曲子还保存得不少. 他仍然在中央大学教他的词曲. 他在这时期, 为我的《清人杂剧二集》写了一篇序.

我们并没有见过多少次面,但彼此的心是相印的.不仅对于我, 对于一切同道者, 他都如此. 他把所藏的善本曲子, 一无隐匿的公开给他的学生们. 友人任中敏、卢冀野二先生都是研究"曲子"的,得他的助力尤多.中敏在北大, 冀野在中大,都是听他的课的.有许多教授们,特别是在北方的,都有一套"杀手锏",绝对的不肯教给学生们.但瞿安先生却坦白无

私，不知道这一套法术。他帮助他们研究，供给他们以他全部的藏书，还替他们改词改曲。他没有一点秘密，没有一点保留。这不使许多把“学问”当作私产，把珍奇的“资料”当作“独得之秘”而不肯公开的人感到羞愧么？假如没有瞿安先生那末热忱的提倡与供给资料，所谓“曲学”，特别是关于“曲律”的一部分，恐怕真要成为“绝学”了。王静安先生走的是“曲史”一条路，但因为藏曲不多，所见亦少，故于明清戏曲史便没有什么大贡献，他的“曲录”是一部黎明期的著作，而不是一部完美无疵的目录。至于瞿安先生则对于此二代的戏曲及散曲，搜罗至广；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才被发现的。经过他加以选择与研讨之后，泥沙和珠玉方才分别了开来。我们研究戏曲和散曲，往往因为不精曲律，只知注意到文辞和思想方面，但瞿安先生则同时注意到他们的合“律”与否。因之，他的批评便更为严刻而深邃。

他的藏书，除曲子以外，还有不少明版书。他榜其书斋曰百嘉室，意欲集合一百种明嘉靖刊本于此室；但似乎因为力量不够，一百种的嘉靖刊本始终没有足额。当他西迁时，随身携带了好几箱的书去，其中当然以曲子书为最多。其余的书都还藏在苏寓。经此大劫，好象还不曾散失。在滇的书，则已由他的学生们在清理编目。这一批宝藏是瞿安先生一生精力之所聚，最好能够集中在一处，由国家加以保存，庋藏在某一国立图书馆，或北京大学或中央大学图书馆中，特别的设一纪念室（或即名为“百嘉室”吧）以作瞿安先生的永久的纪念。这个提议，我想他的朋友们和学生们一定会

赞成而力促其实现的。已印的《奢摩他室曲丛》第一集和第二集，仅不过是瞿安先生所藏的精本的一小部分。其他重要的资料还很多；一旦公开了，对于研究曲子的人，一定是很有作用的。而于瞿安先生一生坦白无私，不以资料为已有的精神，也更能够发挥而光大之。

瞿安先生早年曾写了不少剧本；杂剧有《煖香楼》，写《板桥杂记》所载姜如须与李十娘事；《落茵记》，写一女学生堕落的事；《无价宝》为祝秉纲题黄荛圃《鱼玄机诗思图》而作，“宋廛觞咏，不过陈藏家故实”而已；《惆怅爨》，为《四声猿》型的北曲，凡五折，演四个故事，一为《香山老放出杨枝妓》，二为《湖州守乾作风月司》（二折），三为《高子勉题情国香曲》，四为《陆务观寄怨钗凤词》；《轩亭秋》，记秋瑾被杀事，仅见楔子一套。传奇有《苌弘血》（未见传本），写戊戌政变事；《风洞山》，写明末瞿忠宣尽节事；《东海记》，写孝女殉姑被诛事；《双泪碑》，写汪柳侬事；《绿窗怨记》，为一言情之作。又有《白团扇》及《义士记》，俱未见传本。后又将《煖香楼》改写，易名为《湘真阁》，曾见伶人演唱，但在中年以后，他却不曾有过什么新作。

他的剧本有一个特色，便是鼓吹民族主义，大都写于清末，为那时候的民族革命者作鼓吹宣传之用，象《苌弘血》，《煖香楼》，《轩亭秋》和《风洞山》，全都是的。他尽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革命者的任务。这与他的慷慨激昂的性情很相合的。凡是一个性情真挚，坦白的人，殆无不是走在时

代之前或与时代一同迈步前进的。虽他所用的工具是南北曲，是不大能够演奏的昆腔，然而他是尽了他的一分责任的。

他的《霜厓曲录》，及《霜厓词录》，及《霜厓诗录》，也多慷慨激昂之作。

他很早的便写了一部《词余讲义》和《顾曲尘谈》及《奢摩他室曲话》。后来又写了《词学通论》，《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ＡＢＣ》，《南北词简谱》诸书。而于《南北词简谱》用力尤深。他所选编的书则有《古今名剧选》，《曲选》及《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对于曲史的研究，曲律的探讨，资料的传布，他都尽了很大的心力。从前鄞县姚梅伯（燮）也对曲子很用心，曾作了一部《今乐考证》，选了一部《新乐府选》，但总没有他那末于曲子的各方面无不接触到，而且无不精研深究的。

他讳梅，字瞿安（瞿一作臞或癯）。一字灵鳷，号霜厓，吴县人（原为长洲县学诸生，民国后长洲并入吴县）。清末，尝两应江南乡试，不中，即弃去。一游河南，入河道曹某幕，不久，也就南归。自此，便以教学为终生的事业。

一五　记复社

敌人们大索复社，但始终不知其社址何在。敌人们用尽种种方法，来捉捕复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终未能明白究竟复社的主持人是谁。

复社在敌伪统治的初期，活跃于上海的一个比较自由的小圈子里，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便是出版《鲁迅全集》。

复社是一个纯粹的为读者们而设立的一个出版机关，并没有很多的资本。社员凡二十人，各阶层的人都有。那时，社费每人是五十元；二十个人，共一千元。就拿这一千元作为基础，出版了一部《鲁迅全集》。

当初，几个朋友所以要办复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为了要出版《鲁迅全集》。这提议，发动于胡愈之先生。那时候，整个上海的出版界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根本不想出版什么书。象《鲁迅全集》，也许有几家肯承印，肯出版，但在条件上也不容易谈得好。

“还是我们自己来出版吧，”留在上海的几位鲁迅先生

纪念委员会的人这样的想着。

先来组织一个出版机关，这机关便是复社.

编辑委员会的工作并不轻松. 以景宋夫人为中心，搜辑了许多已刊、未刊的鲁迅先生的著作，加以整理，抄写，编排次序，然后付印. 许多朋友，自动的来参加校对的工作. 煌煌廿巨册的大著，校对的事，实在很不容易. 王任叔先生在这一方面和编辑方面，所负的责任最多. 但假如没有许多热情的帮助，他也是“单丝不成线”的.

印刷的经费呢？资本只有一千元，还不够排印一本. 复社开了社员大会，议决，先售预约. 直接与读者们接触，不经过“书店”的手. 记得那时的定价是：每部八元五角. 我们发动了好些人，在各方面征求预约者。同时，为了补救印刷费的不足，另印一部分“纪念本”，定价每部五十元及一百元，纪念本的预定者也很不少.

居然，这煌煌廿巨册的《鲁迅全集》，象奇迹似的，在上海，在敌伪环伺侦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纪念本印得十分的考究. 普通本也还不坏. 主持印刷发行的是张宗麟先生，他也是专心一意的在埋头苦干着.

最可感动的是，处处都可遇到热情的帮助与自动的代为宣传，代为预约，代为校对. 众力易于成事，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这工作，虽发动于复社，虽为复社所主持，而其成功，复社实不敢独居. 这是联合了各阶层的“开明”的“正直”的力量才能完成之的.

而复社的本身，虽然只有二十个社员，而且决不公布其

组织与社员们的名单，而在当时，这二十位社员的本身，便也代表了“自由上海”的各阶层“开明”的与“正直”的力量。

复社还做了些其他的出版事业。她不以牟利为目的，所以基础并不稳固，营业也不能开展。所可喜悦的，便是这一股力量．这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谁都呈献点什么，谁都愿意为“社”而工作．“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复社里可以说表现得最充分．

这二十个社员，虽然不常常聚会，但团结得象铁一样的坚固．没有一个人对外说起过这社是怎样组织的。关于这社的内容，这是第一次的“披露”．

敌人们疑神疑鬼了很久，侦察了很久，但复社是一个铁桶似的组织，一点缝儿也被他们找不到。经营了近四年，却没有出过一会乱子。可见爱护她的人之多，也可见她的组织的严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社的社员们留在上海的已经很少了．这少数的人开了一次会，决定，在那样的环境之下，复社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便立即作着种种解散的工作。存书与纸版都有很妥善的处置办法。复社起来的时候，象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海涛跳拥，声势极盛；但在这时候，结束了时，也立即烟消云散，声息俱绝。

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虽曾用了全力来追寻复社的踪迹，但象奇迹似的起来，也象奇迹似的消失了去，他们简直无从捕风捉影起．

景宋夫人的被捕，受尽了苦，但不曾吐露过关于复社的

片语只言。她保全了许多的朋友们。

后来，听到不少关于敌人们和敌人的爪牙们怎样怎样的寻踪觅迹的在追找复社和复社的主持人的消息。也有不少人因复社的关系被捕过。但都没有吐露过关于复社的一丝一毫的事。冯宾符先生也是社员之一，他被捕过，且被传讯了不止五六次，但他们却始终不知道他与复社有关。

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一直到了敌人的屈膝为止，敌人宪兵队里所认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关于复社的一件吧。

其实，复社并不神秘。复社是公开的一个出版机关。复社与各方面接触的时候很多。知道复社的组织内幕的人很不少。但在各方面的维护之下，复社却很安全。

凡是敌人们所要破坏的，追寻的，必定要为绝大多数同情者们所维护，所保全的。复社便是一个例子。敌人们的力量永远是接触不到这无形的同情的绝大堡垒的。

复社的社员们，除了胡咏骐先生已经亡故了之外，都还健在；虽然散在天南地北，但都还不懈的为人民，为民主而工作。这个不牟利的人民的出版机关，复社，生长于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同情的维护之中的，将来必会继续存在而且发展的。她虽停顿了一时，但并没有死亡。她将更努力的为最大多数的人民们服务。她的任务并没有终了。

人民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出版组织。

读者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不牟利的为读者们服务的组织。

一六 “废纸”劫

收集故纸废书之风，发端于数载之前，至去岁而大盛，至今春而益烈，迨春夏之交，则臻于全盛之境矣。初仅收及废报及期刊，作为所谓还魂纸之原料。继则渐殃及所谓违碍书，终则无书不收，无书不可投入纸商之大熔炉中矣。初仅负贩叫卖者为之，继则有一二小肆亦为之。后以利之溥而易获也，若修绠堂，修文堂，来青阁，上海旧书商店诸大古书肆亦为之矣。初仅收拾本肆中难销之书，残阙之本，论担称斤以售出，继则爪牙四布，搜括及于沪杭沪宁二铁路线之周围矣，又进而罗织至平津二市矣。于是舍正业而不为，日孳孳于惟废纸破书之是务。予尝数经来青阁修文堂及上海旧书商店之门，其所堆积者，无非造纸之原料也，有教科书，有圣经，有杂志，有大部滞销之古书，有西书，有讲义，自洋装皮脊之过时百科全书，年鉴，人名录，以至石印之《十一朝东华录》，《经策通纂》，《九朝圣训》，以及铅印之《图书集成》残本，无不被囊括以去。每过肆，语价时，肆主人必曰：此书论斤时，亦须值若干若干，或曰：此书之值

较论斤称出为尤廉，或曰：此书如不能售，必将召纸商来，论斤称付之。此或是实情实事。肆主人如急于求售，与其售之于难遇难求之购书者，诚不如贬值些须，售之于纸商之为愈也。商人重利，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岂有蝇蚋嗅得腥膻而不飞集者！于是古书之论值，除善本、孤本外，必以纸张之轻重黄白为别。轻者黄者廉，而重者白者昂，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不能即售者，则即举而付之纸商，其为何等书则不问也。其书之可留应留与否则亦不问也。尝过市，有中国书店旧存古书七十余扎，凡五千余本，正欲招纸商来称斤去。予尝见其目，多普通古书，且都为有用者，若江刻《五十唐人小集》，《两浙輶轩录》，《杨升庵全集》，《十国春秋》，《水道提纲》，《艺海珠尘》等书，都凡七八百种。此类书而胥欲付之大熔炉中，诚可谓丧心病狂之至者矣！肆主人云：如欲留，则应立即决定，便可不至使之成废纸矣。予力劝其留售，肆主人不顾也。曰：至多留下二十许种市上好销者，余皆无用。并且指且言曰：某也不能销，某也无人顾问，不如论斤秤出之得利多而速也。予喟然无言。至他肆屡以此数十扎书为言，力劝其收下。彼辈皆不顾，皆以不值得，不易售为言。自晨至午，无成议，而某肆主急如星火，必欲速售去。予乃毅然曰：归予得之可也！遂以六千金付之，而救得此七八百种书。时予实窘困甚，罄其囊，仅足此数，竟以一家十口之数月粮，作此一掷救书之豪举，事后，每自诧少年之豪气未衰也。属有天幸，数日后，有友复济以数千金，乃得免于室人交谪，乃得免于不举火。每顾此

一堆书，辄欣然以为乐，若救得若干古人之精魄也。且此类事为予所未知者多矣。即知之，然予力有限，岂又能尽救之乎？戚戚于心，何时可已！每在乱书堆中救得一二稍可存者，然实类愚公之移山也。天下滔滔，挽狂澜于既倒者复有谁人乎？惄然忧之，愤懑积中。尝遇某人，曰：家有清时外务部石印大本《图书集成》一部，欲售之，而无应者。以今日纸价论之，若作废纸称去，亦可得二万余金也。予俯而不答。呜呼，人间何世，浩劫未艾！今而后，若求得一普通古书，价廉帙巨，而尚为纸商大熔炉劫火未及者，恐戛乎其难矣。今而后若搜集清代普通刊本，晚清石印铅印本书，恐必将不易易矣。兵燹固可惧，然未必处处皆遭劫也，穷乡僻壤，必尚有未遭兵燹之处，通都大邑亦必尚有未遇浩劫之地。禁毁诚可痛，然亦未必网罗至尽也；千密一疏，必有漏网者在；有心人不在少数，疏忽无知者，尤不可胜计；此皆鲁壁也。而今则大利所在，竭泽而渔，凡兵燹所不及，禁毁所未烬者，胥一举而尽之。凡家有破书数架，故纸一篓者，负贩辈必百计出之。不必论何种书也；不必视书之完阙也；不必选剔书之破蛀与否也。无须泾泾议价，更无须专家之摩挲审定，但以大称一，论担称之足矣。于是千秋万世之名著，乃与朝生暮死之早报等类齐观矣；于是一切断烂朝报，乃偕精心结构之巨作同作废纸入熔炉矣。文献之浩劫，盖莫甚于今日也！目击心伤，回天无力。惨痛之甚，几有不忍过市之感。彼堆积于市门者何物也？非已去硬面之西书，即重重叠叠之故纸旧书。剥肤敲脑，无所不至。（精明之贾，每截下

一书空白之天头，以为旧纸，供修书之用。余谥之曰敲脑。）予但能指而叹曰：造孽，造孽！而市人辈则嬉笑自若，充耳不闻也。经此大劫，大江南北以及冀鲁一带之文献乃垂垂尽矣！伤哉！

这是去年秋天我所写札记中的一部分。《周报》索《蛰居散记》续稿，不及改写，遂以此付之。于体例上殊不相类也。

一七 售书记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

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

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

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裨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的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的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

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那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古宫的断垣残刻，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巨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末，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

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的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的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卖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的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象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廿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

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了囤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的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廿余部——那末，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的在编目，在出售；不断的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望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的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

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致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罢。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一八 我的邻居们

我刚刚从汶林路的一个朋友家里，迁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时，觉得很高兴；因为有了两个房间，一作卧室，一作书室，显得宽敞得多了；二则，我的一部分的书籍已经先行运到这里，可读可看的东西，顿时多了几十倍，有如贫儿暴富；不象在汶林路那里，全部的书，只有两只藤做的书架，而且还放不满。这个地方是上海最清静的住宅区。四周围都是蔬圃，时时可见农人们翻土、下肥、播种；种的是麦子、珍珠米、麻、棉、菠菜、卷心菜以至花生等等。有许多树林，垂柳尤多，春天的时候，柳絮在满天飞舞，在地上打滚，越滚越大。一下雨，处处都是蛙鸣。早上一起身，窗外的鸟声仿佛在喧闹。推开了窗，满眼的绿色。一大片的窗是朝南的，一大片的窗是朝东的；太阳光很早的便可以晒到。冬天不生火也不大嫌冷。我的书桌，放在南窗下面，总有整整的半天，是晒在太阳光下的。有时，看书看得久了，眼睛有点发花发黑。读倦了的时候，出去走走，总在田地上走，异常的冷僻，不怕遇见什么熟人。我很满足，很高兴的住着。

正门正对着一家巨厦的后门。那时，那所巨厦还空无人居，不知是谁的。四面的墙，特别的高，墙上装着铁丝网，且还通了电。究竟是谁住在那里呢？我常常在纳罕着。但也懒得去问人。

有一天早上，房东同我说，“到前面房子里去看看好么？”

我和他们，还有几个孩子，一同进了那家的后门。管门人和我的房东有点认识，所以听任我们进去。一所英国的乡村别墅式的房子，外墙都用粗石砌成，但现在已被改造得不成样子。花园很大，也是英国式的，但也已部分的被改成日本式的。花草不少；还有一个小池塘，无水，颇显得小巧玲珑，但在小假山上却安置了好些廉价的磁鹅之类的东西，一望即知其为“暴发户”之作风。

盆栽的紫藤，生气旺盛，最为我所喜，但可知也是日本式的东西。

正宅里布置得很富丽堂皇，但总觉得“新”，有一股无形的“触目”与触鼻的油漆气味。

“这到底是谁的住宅呢？”我忍不住的问道，孩子们正在草地上玩，不肯走。

房东道：“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这是周佛海的新居，去年向英国人买下的，装修的费用，倒比买房的钱花得还多。”

过了几个月，周佛海搬进宅了；整夜的灯火辉煌，笙歌达旦，我被吵闹得不能安睡。我向来喜欢早睡，但每到晚上

九十点钟，必定有胡琴声和学习京戏的怪腔送到我房里来。恨得我牙痒痒的，但实在无奈此恶邻何！

更可恨的是，他们搬进了，便要调查四邻的人口和职业；我们也被调查了一顿。

我的书房的南窗，正对着他们的厨房，整天整夜的在做菜烧汤，烟突里的煤烟，常常飞扑到我书桌上来。拂了又拂，终是烟灰不绝。弄得我不敢开窗。我现在不能不懊悔择邻的不谨慎了。

“一二·八”太平洋战争起来后，我的环境更坏了。四周围的英美人住宅都空了起来，他们全都进了集中营。隔了几时，许多日本人又搬了进来。他们男人大都是穿军装的。还有保甲的组织，防空的练习，吵闹得附近人家，个个不安。

在防空的时候，他们干涉邻居异常的凶狠，时时有被打的。有时，我晚上回家，曾被他们用电筒光狠狠的照射着过。

有一天，厨房的灯光忘了关，也被他们狠狠的敲门打窗的骂了一顿过。

一个早晨，太阳光很好，出去走走，恰遇他们在练习空防。路被阻塞不通，只好再回过来。

说到通路，那又是一个厄运。本来有一条通路，可以直达大道，到电车站很近便。自从周佛海搬来后，便常常被阻塞。日本人搬来后，索性的用铁丝网堵死了。我上电车站，总要绕了一个大圈，多花上十分钟的走路工夫。

胜利以后，铁丝网不知被谁拆去了。我以为从此可以走

大道了。不料又有什么军队驻扎在小路上看守着，不许人走过。交涉了几回也没用。只好仍旧吃亏，改绕大圈子走。

和敌伪的人物无心的做了邻居，想不到也会有那末多的痛苦和麻烦。

一九 秋夜吟

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饭。”

小石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在教室里发问最多，先生们一不小心，就要受窘。但这次在忧患中遇见，他却变得那么沉默寡言了。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地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

我突然的找到他了，突然每晚到他家里吃饭了，然而这仿佛是平常不过的事，早已如此，一点不突然。料理饮食的也是小石一位朋友的老太太，我们共同享用着正正式式的刚煮好的饭，还有汤，——那位老太太在午间从不为自己弄汤菜，那是太奢侈了。——在那里，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直到有一次我在这“晚宴”上偶然缺席，第二天去时看到他们的脸上是怎样从焦虑中得到解放，才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我的不

安全。那位老太太手里提着铲刀，迎着我说："暖呀，郑先生，您下次不来吃饭最好打电话来关照一声啊，我们还当您怎么了呢。"

然而小石连这个也不说。

于是只好轮到我找一点话，在吃过晚饭之后，什么版画，元曲，变文，老庄哲学，都拿来乱谈一顿，自己听听很象是在上文学史之类，有点可笑。

于是我们就去遛马路。

有时同着二房东的胖女孩，有时拉着后楼的小姐L，大家心里舒舒坦坦的出去"走风凉，"小石是喜欢魏晋风的，就名之谓"行散"。

遛着遛着也成为日课，一直到光脚踏屐的清脆叩声渐渐冷落下来，后门口乘风凉的人们都缩进屋里去了，我们行散的兴致依然不减。

秋天的黄昏比夏天的更好，暮霭象轻纱似的一层一层笼罩上来，迷迷糊糊的雾气被凉风吹散。夜了，反觉得亮了些，天蓝的清清净净，撑得高高的，嵌出晶莹皎洁的月亮，真是濯心涤神，非但忘却追捕，躲避，恐怖，愤怒，直要把思维上腾到国家世界以外去。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性灵，谈人类的命运，争辩月之美是圆时还是缺时，是微云轻抹还是万里无垠。……

小石的住所朝南再朝南，是徐家汇路，临着一条河，河南大都是空地和田，没有房子遮着，天空更畅得开，我们从打浦桥顺着河沿往下走往下走，把一道土堆算城墙，又一幢黑

默默的房屋算童话里的堡垒，听听河水是不是在流。

走得微倦，便靠在河边一株横倒的树干上，大家都不谈话。

可是一阵风吹过来了，夹着河水污浊的气味，熏得我们站起来。这条河在白天原是不可向迩的。“夜只是遮盖，现实到底是现实，不能化朽腐为神奇！”小石叹了口气。

觉着有点凉，我随手取起了放在树干上的外衣，想穿。“嗄！”L叫了起来：“有毛毛虫。”外衣上附着两只毛虫呢，连忙抖拍了下去。大家一阵忙，皮肤起着栗，好象有虫在爬。

“不要神经过敏了，听，叫哥哥在叫呢。”

“不，那是纺织娘。”

“那里，那一定是铜管娘。”

“什么铜管娘，昆虫学里没有的名字。”

其实谁也没有研究过昆虫学。热心的争论起来了，把毛毛虫的不快就此抖掉。

“听，那边更多呢！”“那边更多呢。”

一路倾听过去，忽然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叫：

“在这里了。”

那是一个穿了睡衣裤的小孩，手里执着小竹笼，一条辫子梢上还系着红线，一条辫子已经散了，大概是睡了听见叫哥哥叫的热闹又爬起来的。

“你不要动，等我捉，”铁丝网那边的丛莽中有一个男人在捉，看样子很是外行，拿了盒火柴，一根根划着。

秋虫的声音到处都是，可是去捉呢，又象在这里，又象在那里，孩子怕铁丝网刺他，又急着捉不到，直叫。

小石也钻进丛莽里去了。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也停下来，放好了车，取下了车上的电石灯，也加入去捉了。

这人可是个惯家，捉了一会，他说“不行，这样，你拿着灯，我们来捉，”原来的男人很听话的赶快把灯接过来，很合拍的照亮着。

果然，不一会，骑自行车的人就捉到了一只，大家钻出来，孩子喜欢得直跳。

骑自行车的人大大的手里夹着叫哥哥，因为感觉到大家欣赏他的成功而害羞，怯怯的说道：“给谁呢？给谁呢？”

原来在捉的男人就推给小石说：“先给他吧，他不会捉的。”孩子也说：“给你吧，我们还好再捉。”

小石被这亲热的退让和赠予弄得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走开去，说：“那里，那里，我原不想要，我是帮你们捉的，”想想自己又不会捉，又改说：“我不过凑凑热闹。”

我们也说：“小妹妹别客气了，把它放在笼子里吧，看跳掉了。”

那个孩子才欢欢喜喜感谢地要了，男人和骑自行车的又钻进丛莽中去。

小石一边走，一边笑，一边咕噜，“我又不是小孩子，推给我做什么。”

L说：“人家当你比那个小孩还小啦，这又有什么可脸

红的呢。”

于是小石就辩了：“月亮光底下看得出脸红脸白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饫饮这善良的温情而陶然了。

走得很远，回过头去，还看得见从莽里一闪一闪亮着自行车的摩电灯。

附 录

忆 愈 之

愈之姓胡氏，名学愚，上虞人，是一个苦学出身的学者。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提倡过世界语，创导过写别字运动。他身材矮小，组织的能力却极强。我们在二十几年里，没有间断过一天的友谊。我们还同事过七八年，几乎天天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脸红耳赤的情形发生，他永远是心平气和的，永远是和蔼明朗的，只除了一次，他曾经受过极深刻的刺激，态度变得异常的激昂而愤慨。

那一次是清党的事件刚发生，他走过宝山路，足下踏着一堆的红血，竹篱笆旁，发现了好些被杀的尸身。他气促息急的跑到了商报馆，立刻便草拟致几位党国元老的代电。这是他从“编辑室”的生活转变到政治活动的开始，也是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的开始。

他从巴黎经由莫斯科回国，使他思想变动了不少。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似较秋白的《赤都心史》尤得读者的赞颂。

我在北平教书的时候，他在上海正和宋庆龄杨杏佛诸位

从事于济难会的工作。他始终站在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暴力，反对杀戮。

“九·一八”事件后，他成了最热忱的抗日家。他主编着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使这古老的定期刊物放射出异常焕烂的光彩。然终于不为那古老的出版家所容，他不得不辞职以去。

他为开明书店主持《月报》的编辑，这是中国杂志界的一个创格的刊物。

他为生活书店创办《世界知识》，尽了不少介绍国际新闻和常识的功能。这杂志的性质，也是空前未有的。

他决定着《文学》的创刊，《太白》的出版，《中华公论》的编辑，《文学季刊》和《世界文库》的发行。最生气蓬勃的生活书店的一段历史乃是愈之所一手造成的。

《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也是他所一力主持着的，在那样人力物力缺乏的时候，但他的毅力却战胜了一切，使这二十巨册的煌煌大著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

伟大悲壮的鲁迅葬礼的举行，也是他在策动着的。

他团结了许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物，做着救国运动，这运动的人物们在上海曾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十二月八号”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才解体。

他组织了许多有力的刊物与团体，但从来不把持着他们；他总是“功成身退”的。除了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们以外，外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是那些刊物和团体的真正发动者和主持者。

他的眼光是那样的远大，他的见解是那样的明晰，他的思想是那样彻底，他的心胸是那样的博大，人家被包罗在内而往往尚不自知。

他宽恕，他忠厚恳挚，对于一切同道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句“违言”，没有一点不满的批评。但他却坚定忠贞，从来不肯退让一步，从来不曾放弃过他自己所笃信的主张和立场，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在朋友们里，能够象他那样的伟大而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恐怕只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可以相提并论罢。

我从来不大预问外事，也最怕开会，但自从见到愈之把银行界的人物和百货公司的主持人也拉来开会以后，我不能不受感动，不能不把自己从“隐居”生活里跳出来了。

“八·一三”的淞沪战争失败以后，他便撤退到内地去。我们见面的机会少得多了。但他在上海一带所留下的影响还是极大。

我们在香港再见到几次。他那时又在那一带组织着很多，很重要的事业，象文化供应社便是其一。这个通讯社在国际宣传上有了很大的效果。

自此以后，我们便不再相见了。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他和沈兹九，陈嘉庚都在新加坡。那时他正有计划的想在南洋一带发展一部分的事业。新加坡陷落后，对于他的安全，我和许多朋友们都特别的牵念着。有过种种不同的传说。

过了一年，他忽来了一张明片（当然是用的假姓名），

说他是平安着。这使我们十分的兴奋和安慰。

日本投降的时候，从内地来的消息，说，愈之已经在南洋病故。我不肯相信这悲惨的恶耗。象愈之那样的人，我总相信他是不会便这样的死去的。但消息渐渐的被证实了。听说《中学生》曾经出版过一个纪念他的专号。

难道愈之果真这样的便死去了么？我还是不能相信，不肯相信！

在无数的殉难死亡的朋友们里，没有比愈之的失去，更使我伤心，难受的了！

温和敦厚，信仰坚定的愈之，如果失去了，将是国家怎样大的损失呢？有多少的建国的工作正在等候着他来组织，来专心一志的干着！他如果失去了，对于这些工作的事业，将有怎样大的影响呢？

我还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这只是“海外东坡”般的误传！

我祈祷着愈之的安健！为我们的国家也为许多的朋友们！

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写

关于愈之病故的误传，当时曾引起各方面的震动。但此文发表时，已证明是“海外东坡”之谣。现并录于此，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

集 外

记陈三才

象晴天的一个霹雳似的，朋友们传说着陈三才先生被捕的消息。没有理由使我们相信：陈先生会遭逢这个不幸的。虽然在那个时候，个个沦陷在敌人后方的人，生命的安全随时会发生危险，但象他那样的人，似乎最不容易有什么"牵惹"。

他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留学生，出身于清华学校，做了好几年的北极公司经理，和通惠机器公司董事。他是那样的和现在的政治隔绝。谁也不能明白，这一次他怎么会被牵涉到"政治"旋涡里去的？

他被捕后，不到三个月，便被汉奸杀死；就义的地点是南京，雨花台。

汉奸们那末公开的宣布杀人，恐怕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们向来惯用的鬼鬼祟祟的暗杀手段，为什么这一次会这样的"大张旗鼓"呢？如果没有什么深仇大怨，他们怎么敢下这个辣手呢？

在陈先生就义后，才有人传说，他是负着重要的地下工

作的使命的。他计划着一个锄除汪逆精卫的布置。可惜布置未就，他的计划，却被汉奸的特务们所发现了。

他在监狱里，曾寄出好几封信。在就义的前两天写给他家属的一封长信，可以说是最后的一封，也可以说是他的遗嘱。原信是英文，他的家属曾把它译出。

“在沪六日，可谓最苦。备尝悬吊及各种肉刑。而廿四小时后之处置，尤为严厉。住所，食物，绝非人情所能忍受。

“迁移后的待遇，确是好得多。生活很有规则，也合卫生。不啻又恢复了我的学校生活。不过这里的学生待遇，是有等级的，分了头、二、三三等。……我侥幸作了头等生，事实上我和其他四位还作了特等生，有机会和教授先生们谈话，并享几种为其他头等生所不许的特权，譬方可以公开吸烟，而别人只能背地吸。

“我的健康的确有进步。照起镜子来，显然我的气色比前好，眼睛也比较的有光。在我自己可以说比初来时还年轻了几岁，也未可知。这次南京短期旅行，于我益处很多，身体上的改进，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是内心的进步。长日的闲暇，迫我静心思索，对于过去生活，感觉无限空虚。这种反省，固然在一年前就已开始，可是直到最近，才深切领悟真理的全部。约近一年以前，决意创造我的新生命，那正是我去香港之后。因为在那次旅行，得到机会遇见多年阔别的老朋友，给我新的刺激。我可以清清楚楚把那些朋友，

分为两派。一派只图自己享乐，其他一派则生活有一定的目标，并且不辞劳作，以求达到目的。前一派人，以外貌观之，无忧，无虑，快乐，友善。但是他们的友善，总不免于虚伪。他们服装讲究，出入华贵之门，固然常为纨袴子弟所称羡，但是他们的生命同岁月，不知所谓地流荡过去，毫无成就。后一派人，外貌看来严肃，缺少生气，可是一旦得到他们的友谊，就会持久不变。他们虽深藏不露，而识见极稳定。这一派人似乎不及前一派那些人聪明，但是有毅力，终会很稳健的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当第一派人向下坠落的时候，后一派人不停的向前努力；这不用智者就会知道在生命竞走上是谁占先。我识别了这两派不同的人，却在表面上保持着同样的友谊。……不待我认清自己，众人早已这样认定，一直认定我是一个轻浮、没有思想的留学生，只知道寻欢、作乐，不肯埋头苦干。噫，何种的认识，何种的觉悟！

“我的朋友不见得全是错误。他们的判断，该是对的。我该是属于第一派。仅仅这次在香港，我才发觉我不情愿属于第一派。只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许你已经留心到，我正在努力改变，不饮酒，不吸烟，对于赌博，也是尽量减少。渐渐避免同我从前那样生活方式的朋友们来往——使我大为惊奇的，自从和这一些人疏远以后，我往来的朋友，简直没剩下几个。我素以为自己朋友很多，这一来，我的虚荣心不免受了重大的打击。也

正可以证实，我的朋友大半都是属于这一流，而我自己也不能除外。既经觉悟，我不必太懊丧枉费了多年的时力来结交这些朋友。从新开始还不为晚啊！

“最近两月，我得到反省的机会。思想的结晶，坚定我前者的决心。而这一次的特点是加上了道德的信念。我自信过去的生活，自私而无用。同时，我相信，将来惟一的幸福是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生活上。我差不多费了十三年的工夫来了解：一个人的幸福不在乎自己有所得，而在乎为别人服务。我愿上帝赐我恩惠，使我死心蹋地有坚决的信心。”

他的转变，在这信里，写的是那末恳挚而真切。香港之行，使他与爱国者们之间取得了密切的联络。他的地下工作大约便在那时开始的。他有很好的社会关系，和很好的工作掩护。汉奸们决不会怀疑到他的。所以他的初期工作，大约相当成功。但不久，终于被出卖了。他对于出卖他的人，竟也宽恕着：

“希望我的性灵也能得到改善。新约我已读了好几遍，也学会祈祷。虽然我还没有成一个真实信徒，至少已经接近基督的教义。比方说，我已经能抑制自己不去仇恨这次演成事变的人们，反而怜悯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如果有罪，将来自有公正的处罚。我是什么人，怎配来裁判？一切的事，许都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南京之行，于我不利，正因为我过去生活的放荡而有应得之责罚。反而言之，若此行于我有利，那就许是上帝的旨意。无

论如何，我都无怨尤。”

这已是“仁人”的用心了。志士和仁人原是分别不开的。他的见道之言，证实了这次的中日之战，虽然显现了自私自利的卑鄙无耻的汉奸们的面目，同时也觉醒了无数的青年们，放弃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而从事于祖国的解放战争。战争使我们分别出，黑与白，邪与正，忠与奸来。战争使社会的“渣滓”们沉沦了下去，而使清新的分子浮现了出来。虽然那些清新的分子们被牺牲，被杀害了不少，而留下来的却都是建国之宝。可惜的是，陈三才先生却永远不能参预这个建国的大业了！

三才先生名定达，江苏昆山人，生于清光绪念八年，殉难于民廿九年十月二日，年三十九。

惜周作人

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郑孝胥“走马上任”去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惋惜；陈柱暗中受津贴，结果不得不明目张胆的公开出来，我们也一点不为之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阵伍中，这种人的失去，对于我们的文坛是丝毫不足轻重的。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孝胥的《海藏楼诗》也不是“今人”之物；一个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楼，一见，便诧叹道：“穷的诗人住了这样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个穷诗人呢。”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本来不会有什么真的灵魂的。

周作人却和他们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长成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译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味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

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鲁迅先生是很爱护他的，尽管他们俩晚年失和，但鲁迅先生口中从来没有一句责难他的话。“知弟莫若兄。”鲁迅先生十分的知道他的癖气和性格。倒是周作人常常有批评鲁迅先生的话。他常向我说起，鲁迅怎样怎样的。但我们从来没有相信过他的话。鲁迅是怎样的真挚而爽直，而他则含蓄而多疑，貌为冲淡，而实则热中；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样会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离开北平的时候，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十分的浓厚。我劝他，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他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的迫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

“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的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他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不能来。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托辞。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

茅盾他们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听到关于他的传说，有过联名的表示。但在那时候，他实在还不曾“伪”。绍虞有过一封信给我，说，下学期燕京大学已正式的聘请他为教授，他也已经答应下来了。绝对的没有什么问题。我根据这封信，曾经为他辩白过。我们是怎样的爱惜着他！生怕他会动摇，会附逆，所以一听到他已肯就聘燕大，便会那样的高兴！

但他毕竟附了逆！燕大的聘书他也退回去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枪子为大衣纽扣所抵住，并没有穿进，所以他便幸免了。一个车夫替了他死去。

然而实际的原因恐并不是如此。那一场“暗杀”并不能促使他背叛祖国。世间那有如此的“一不做，二不休”之人呢？其远因必定是另有所在的。“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陆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他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日本帝国要

如此崩溃，世界会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钱稻孙，另一个背叛祖国的人，曾对一个伪立北京大学的教员——那一个人不愿用真实的姓名，要求改用一个假名字应聘，生怕将来政府回来了，会有问题——说道："你以为会这样的么？我从来没有作此想过！"因为他们是那末坚定的相信"中国的运命"，所以他们才敢于做汉奸。这恐怕又是汉奸的产生的原因之一。

周作人也便是这末想，而成为一个汉奸的。

即在他做了汉奸之后，我们几个朋友也还不能忘情于他。适之先生和尹默先生好象都曾苦劝过他，而凤举先生和我，也常在想着，怎样才能使他脱离了那个汉奸的圈子呢？

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我们几个朋友谈起，还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他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对他的附逆，觉得格外痛心，比见了任何人的堕落还要痛心！我们觉得，即在今日，我们不单悼惜他，还应该爱惜他！

一 个 女 间 谍

我读着马黛赫她的传记，如读着福尔摩斯最精采的探案，如读着孙悟空的历险的故事；神往于她的冒险、闪避、隐伏、刺探、组织的技巧，她的出生入死，履险如夷的胆气。她的倾城一笑，笑得使闻者骨酥，受者忘死。她仪态万方的出现于血腥扑鼻的地方，在最紧张、最危险的当儿，救全了，或者陷害了几千几百乃至几万个健儿；她救全了，或者陷害了一城乃至一国的生命的安全。她如女神似的，不是维娜丝，却是狄爱娜，在柔若无骨，艳如桃李的绝代风姿里，却隐藏着一颗精钢铸就的心。她是摩登伽女，是鱼篮观音。谁知道她的娇声颤笑里是一声叱咤呢还是婉妮的柔情？谁知道她的轻盈的步履里，跳的是萨坦的舞曲呢还是人间的欢愉？谁知道她的迷阳城惑下蔡的一个娇好无比的人儿，想的是倾心的爱恋呢，还是在转着恶毒的念头？

这样的间谍的生活，在旁观者读来果然是眉飞色扬的，但在身当其冲的人，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死亡线上进进出出的，好象走钢丝的女卖艺者一样，偶然的一个疏忽，便会从

高空上摔了下来，就此了结了她的一生？

当更阑人静的时候，幽绿的灯光，照着倚在光滑柔暖的枕衾的人，舞倦了的，或半醺着的，身和心都感着劳瘁，这人，她，将有怎样的感触呢？轻荡着的柔情，强烈的厌恶，莫名的疲倦，异常的凄清，将交织着咀嚼着她罢。

但只有一个最强大的热情，一颗爱祖国的心，把那些闲愁闲恨全都扫荡了开去。她一切是为了祖国；为了祖国，她不惜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不惜牺牲色相；为了祖国，她不惜忍受着一切的厌恨与痛苦；为了祖国，她不惜佯羞假笑，假意儿伴着她所最厌恶的人；为了祖国，她不惜任何的迁就与委屈。

这爱祖国的心，便是那一颗不可动摇的精钢铸就的心，足够抵抗得住一切的诱惑和痛苦。

在这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女间谍的活跃决不会逊于第一次大战，而活跃的范围却更为广大。

我国的女间谍们的故事，时时有得听到，说得是那末神出鬼没，然而后来却证实都是些子虚乌有之谈。

我所遇到的却是一个真实的女间谍，一件真实的悲惨的故事。

有一个青年友人，行为很整饬，但在一个时期，人家传说他常和一个女友在一处。这女友的行为相当的“浪漫”，时时的出入于歌坛舞榭，且也时时的和敌人及汉奸们相交往。

我曾经劝告过他。他只是笑笑，不否认也不承认。我不

便多问什么。

有一天，在霞飞路上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他和一个女友在一处，谈得很起劲。我只和他点头招呼。他介绍着道："这位是陈女士。"我们互相微颔了一下。

这位陈女士身材适中，面型丰满；穿得衣服并不怎样刺眼，素朴，但显得华贵；头发并不鬈烫，朝后梳了一个髻，干净利落。纯然是一位少奶奶型的人物，并不象一个"浪漫"的女子。

隔了一个多月，他跑来告诉我道："你见过的那位陈女士已经殉难死了！"

我吓得一跳，问道："为了什么呢？"

"她是一位女间谍，"他道，"曾经刺探到不少敌人和汉奸们的消息和行动。她的父亲是一位法院里的检察官，她的母亲是一位日本人。她的日本话说得很好。因此，好久就已混入汉奸群中工作着。最近几个月，她常常警觉到有人跟随着她，注意或监视着她。她觉得有危险。有一夜，她在一个跳舞的地方，发现她的手提包失踪了。隔了一会，她舞罢回到座上时，又发现手提包已经放在原处。检点了一下，没有短少什么。但她知道这手提包一定曾被严密的检查过。她把这事告诉我，说，也许会有什么危险吧。但神色很镇定，一点也没有退避或躲藏的意思。照常的生活着，照常的刺侦着。"

"后来怎样的被破获的呢？"

"我知道她被捕的消息已在她殉难之后。这是另一位做

工作的人告诉我的。她计划着要刺杀丁默邨，那个“七十六号”的主人。在一个清晨，丁伴她到一家百货公司去购物。壮士们已经埋伏好在那里。丁富有警觉性，也许，也竟已准备好，一进门，便溜了出来，来不及放一枪。为了到这个地方去的事，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因之，她的嫌疑极重。她被捕了，经过了残酷的刑讯之后，她便从容就义了。”

他说完了话，默默的为这位女英雄志哀，我也默默的在哀悼着仅见一面的这位爱国的女间谍！

为了祖国，她不止几次出生入死；为了祖国，她壮烈的死去！比死在沙场上还要壮烈！

可惜他不久就避到内地去，至今还未回来，竟没有机会问他陈女士的名字。

女间谍的生活不是玫瑰色的，却是多刺而艰苦异常的。但为了祖国，她头也不回的走上了死亡线上。

记平祖仁与英茵

平祖仁先生是国立暨南大学的毕业生，曾在暨大服务过。我和他同过事，但不大熟识。他不久便转到政界里去。‘八一三’以后，他做了某区的专员，但在上海做工作，行踪很秘密。

有一次，被敌人侦知他的住所，派了好几个人去暗杀他。他从外面回家，刚下汽车，便听见枪声几响。他机警异常，立即躲到汽车后面。刺客们还是追了过来。他连忙匍伏到汽车底下去。街上的人们挤着看热闹。刺客们逃走了。他从容从车盘下面爬了出来，扣门进去，一点也不曾受伤。

从此，他更加小心起来，进出都十分的戒备着。许多人劝他赶快离开上海。但他总不肯走开去，甘愿冒着万险，一直的住下去，直到他被伪方所逮捕为止。

他被捕后，囚禁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那个魔穴里。听说敌伪的人物们，其初是威胁，其后是利诱。他不为所动，反以好言劝伪方人物弃暗投明。最后，他们不得不用“刑讯”来迫取口供。他们想从他口里得到若干秘密组织和其活动的

线索。他受尽了人类所能忍受的体刑，甚至他的浓密的头发，也被刑者一根根，一把把连根的生生的拔下来；满头是血淋淋的，…但他始终傲态如常，不曾泄露过一句机密的话，一点秘要的消息。

当他被捕进去的时候，许多和他一同做工作的人们，或和他有任何联系的人们都异常的恐慌着，生怕“变出非常”，有被牵连进去的可能。然而迟之又久，他们却都还很平安。平祖仁先生以自己的大无畏的勇气，挺身受刑，来保全他们。不曾有一个人因他的缘故遭到不幸。

许多人至今还很感激着他！

它们无可奈何他，只好把他扣在囚牢的角落里，长久的囚禁着，不再加理会。

但在这长期的囚禁中，他却在同囚者中发生了作用。他公开的劝说他们——那些囚犯有的是鸦片贩卖者，走私者，窃盗，但也有志士们在内——指示他们以应走之路，且把他们组织起来。

这组织被它们发觉了，它们现在知道，他不仅不能为它们所用，且是那末“危险”的一个人物，留下来总是一个祸根。于是，在一个清晨，平祖仁先生和另一志士及两个强盗一同被提出枪杀了。

他就义的时候，很从容、安详。

伪组织的公开宣布杀人，在陈三才先生被杀之外，这是第二次。

他的尸身由家属领了出来，但贫至无以为殓。他的朋友

和同道没法子出面帮助他，因为汉奸们正要追寻着这一个线索而一网打尽他们。英茵，一个话剧和电影的女演员，出来为他料理后事。英茵非常懂得他的环境和他所往来的人物，却一个也不去找他们，她聪明地不使她成为一根线索，她只为他向她自己的影圈子里去募集若干款子，作为是她自己借用的。

她所筹借到的钱，不仅把他葬事办好，还留下一部分供给他的家属的以后的生活费用。

而英茵，她把关于他的一切善后的事务料理清楚后，独自一个人在一个旅馆房间里，仰药自杀了。

第二天晨报上大字刊载着英茵自杀的消息，却没有说出她为什么要自杀的原因。

这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或叙事诗的，我却只是这样潦草的画出一个糊涂的轮廓，渲染和描写的工作是有待于将来的小说家、戏剧家或诗人的。故事太真实了，时间太接近，人物太熟悉了，有时反不易有想象的描绘。

重印附记

案头上放着一本一九五一年五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蛰居散记》。父亲写的这本小书，从初版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十年了；这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未曾再版过。前几天，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梦熊同志来信告诉我，此书将作为他们正在编辑的《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在近期内重印，并要我写一篇“重印附记”之类的东西；于是我从书架上找出了这本蒙上了一层厚厚灰尘的小书。

这是本散文集。大部分刊登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九至十二月间的上海《周报》上。在这些短文中，作者以生动、感人的笔触，记述了八年离乱中，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上海的切身感受与见闻，对敌人和他们的走狗们的无比憎恨，以及不愿作亡国奴，以各种方式坚持抗战工作的亲身经历。

动物的蛰伏，是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父亲在漫长的八载严冬中，曾长时期隐姓埋名，独居斗室，以文具商的身份为掩护，从事着抗日救亡，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神圣事业，不正是为了迎接祖国胜利的春天的到来么！我想，这大概就

是他之所以把这本集子起名《蛰居散记》的道理吧。

我是喜欢这本书的。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她把我带回到了朦胧的孩提时代。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当年“蛰居”的那座小楼上的斗室。那架上架下，桌上桌下，乃至床上床下，到处堆满着的线装书；那常年不熄的小火炉上吱吱地呻吟着的水壶。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不得不常年地在这个小炉子上，自开伙仓，烧水做饭。冬天犹可，到了炎夏，小楼象在蒸笼中一般，要是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谁能够熬受得了！

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打点着一捆捆次日将要出卖的古书，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买书本是父亲生平一大乐趣；可是在那年月，为了一家老小的温饱，有时却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多年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换来的书，再拿去换米。

我仿佛又看到和听到了父亲站在讲台上，严肃而镇定地为学生们讲授着“最后的一课”，突然窗外响起了车轮辗地声，一面白地旭日旗在寒风中飘舞而过……“现在下课！”父亲以悲壮的语调宣布着。这一天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沦陷区人民的没有尽头的“轧”米长队，那一具具“只剩下一副骨和皮”的饿殍的惨状。

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那些不甘做亡国奴的仁人志士在暮影中，在敌寇的刺刀下，以各种方式与占领者们周旋，进行着抗日救国的崇高事业。

我仿佛……

这一幕幕儿时耳闻目睹过的一切，如果说在那时只是很依稀的印象的话，那么现在却象电影镜头似地清晰地重现在眼前。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她使我加深了对父亲为人的了解。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表现出来的对祖国的坚贞情操，和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我看到了体现在我们的前辈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固有的那种雪中青松般的伟大的民族性格；而这对我们的今天和将来，都是最宝贵的一种精神财富啊！

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她从某些生活侧面，为我们回顾和研究那一去而不复返的灾难岁月提供了一些真实而形象的珍贵史料。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旧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而更加激发我们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我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真理理解得更加深刻。

总之，我是很喜欢这本书的，亲爱的读者，您呢？

集外的四篇遗作是由“丛书”的编辑同志从《周报》上辑出补入，按发表前后排列于后。父亲生前所以未加编入，是有种种原因的，但从反映历史面貌的角度看，还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想来读者也是欢迎的吧！

最后，乘此书重印的机会，我代表先父的在天之灵，向这套“丛书”的编辑者和组织者，以及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这本书重新和读者见面。

郑尔康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北京

封面环衬设计　范一辛

作品介绍

《蛰居散记》是郑振铎抗战时期留居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时耳闻目睹的真实记录。作者以满腔爱国热忱，朴实清新文笔，记载了进步的爱国人士，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侵略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反映了在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统治下，人民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揭露了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投机商人的罪恶勾当。它把读者带回到那个灾难深重的黑暗年代，是一部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散文集。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第一辑

书号：10173·351

定价：　0.37元